

-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 AMI 综合评价核心期刊
- ★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
- ★ 中国农林核心期刊
- ★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第一批认定学术期刊
- ★ 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全文收录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主办单位 中国农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指导单位 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

协办单位 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
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农业行业分会)
农业农村部国际交流服务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处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WORLD AGRICULTURE

世界农业

刊名题字：吴作人
1979 年创刊
月 刊



世界农业编辑部
微信公众号

总字第 557 期
2025 年第 09 期

世界农业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马有祥

副 主 任 (按姓氏笔画为序)

广德福 马洪涛 王 平 朱信凯 杜志雄 何秀荣 张陆彪 顾卫兵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林萍 韦正林 仇焕广 孔祥智 叶兴庆 司 伟 吕 杰 朱 晶 朱满德 刘 辉
刘均勇 李先德 李翠霞 杨敏丽 吴本健 宋洪远 张林秀 张海森 张越杰 陈昭玖
陈盛伟 苑 鹏 罗小锋 罗必良 金 轲 金文成 周应恒 赵帮宏 赵敏娟 胡冰川
姜长云 袁龙江 聂凤英 栾敬东 高 强 黄庆华 黄季焜 彭明喜 程国强 蓝红星
樊胜根 潘伟光

主 编 王 平 李庆海

副 主 编 郭 辉 张丽四

执行主编 贾 彬

责任编辑 卫晋津 张雪娇 李 辉

编 辑 吴洪钟 汪子涵 陈 璠 程 燕

SHIJIE NONGYE

出 版 单 位 中国农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印 刷 单 位 中农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
(北京 782 信箱)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局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18 号楼

邮 编 100125

出 版 日 期 每月 10 日

电 话 (010)59194435/988/990

投 稿 网 址 <http://sjny.cbpt.cnki.net>

官 方 网 址 <http://www.ccap.com.cn/yd/zdqk>

定 价 28.00 元

ISSN 1002 - 4433

CN 11-1097/S

◆凡是同意被我刊发表的文章, 视为作者同意我刊将其文章的复制权、发行权、汇编权以及信息网络传播权转授给第三方。特此声明。

◆本刊所登作品受版权保护,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摘编。

构建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帮扶长效机制的经验及启示	周子铭 高 鸣 (5)
脱贫劳动力就业现状、问题及常态化帮扶机制构建	种 聪 李祺临 (16)
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群体代际传递的影响研究	吴贤荣 罗小锋 (26)
政策框架下农业支持保护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史卫民 袁世武 (42)
中美玉米国际竞争力差距溯源与中国突围路径研究	丁永潮 吕开宇 姜小鱼 (54)
加入 CPTPP 对中国农业影响的量化评估及政策启示	徐邵文 钱静斐 陈秧分 (65)
SPS 标准距离与中国农产品出口质量升级	杨晓云 王 露 冉 璐 等 (78)
财政资金投入与参保农户“获得感偏差”：基于中美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效果对比分析视角	张 姝 张新雪 李 雪 等 (90)
共生视角下特色农业“链主”企业联农带农机制研究	蔡 洁 谢怡薇 李文静 等 (104)
农民培训对象的瞄准和遴选何以偏差？	张一珠 曾俊霞 龙文进 等 (116)
其他	
国际农产品市场价格与贸易形势月报（第 46 期）	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预警救济专家委员会 (128)
国际粮农动态：联合国粮农组织-中国南南合作计划推动巴拿马山村数字化进程等 4 则	(132)
2025 年 8 月世界农产品供需形势预测简报	张明霞 (137)
农业贸易百问：巴西构建了一套怎样的农业贸易谈判机制？	孙 玥 (141)
新形势下创新性开展展会工作的思考与认识 ——以智慧农业博览会为例	张怀墨 杨尚琼 (143)
美国近期“蛋荒”的主要原因和应对举措对我国禽蛋类产业发展的启示	葛培媛 宋 莉 赵文佳 等 (146)

Experiences and Insights in Building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Helping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in Underdeveloped Regions	<i>ZHOU Ziming, GAO Ming</i> (5)
Employment Status and Problem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Labor Force and Construction of Normalized Assistance Mechanism	<i>CHONG Cong, LI Zhenlin</i> (16)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Low-income Groups	<i>WU Xianrong, LUO Xiaofeng</i> (26)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Agricultural Support and Protection under the Policy Framework	<i>SHI Weimin, YUAN Shiwu</i> (42)
Researches on the Traceabil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Gap of Cor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 S. and China's Breakthrough Paths	<i>DING Yongchao, LV Kaiyu, JIANG Xiaoyu</i> (54)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the Impact of Joining the CPTPP on China's Agriculture and Policy Implication	<i>XU Shaowen, QIAN Jingfei, CHEN Yangfen</i> (65)
SPS Standard Distance and Quality Upgrading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Exports	<i>YANG Xiaoyun, WANG Lu, RAN Lu, et al</i> (78)
The "Deviation of Sense of Gain" between Fiscal Fund Investment and Insured Farm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Fiscal Subsidy Effects of Agricultural Insurance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ZHANG Shu, ZHANG Jinxue, LI Xue, et al</i> (90)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Specialized Agricultural "Chain Master" Enterprises Connecting and Empowering Farm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mbiosis	<i>CAI Jie, XIE Yiwei, LI Wenjing, et al</i> (104)
Why Does Targeting and Selection of Farmer Training Participants Deviate?	<i>ZHANG Yizhu, ZENG Junxia, LONG Wenjin, et al.</i> (116)

构建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帮扶长效机制的经验及启示

◆ 周子铭^{1,2} 高鸣³

1.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阿文化和旅游合作研究中心 北京 100024;
2.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3;
3.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北京 100810)

摘要: 推动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发展是实现托底性帮扶的关键路径。本文系统梳理了中国农业产业发展的现实基础, 研究发现, 当前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面临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技术缺口与人才流失并存、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失衡、准入受限与营销渠道不足四大挑战。基于国际比较视角, 本文深入剖析了美国、日本和英国在推动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发展的政策实践, 并从生产资料积累、资源配置效率和产业收益分配三个视角总结了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帮扶的主要经验。在此基础上, 创新性地构建了包含基础保障机制、技术赋能机制、产业引领机制和市场拓展机制的四维分析框架, 为建立健全中国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帮扶长效机制提供了系统性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欠发达地区; 农业产业; 国际经验; 帮扶机制

DOI: 10.13856/j.cn11-1097/s.2025.09.001

1 引言

推动欠发达地区的农业产业发展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环节。作为经济增长和农户增收的基础性产业, 农业在吸纳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在欠发达地区, 由于劳动力普遍存在年龄结构偏大、技能水平较低等特征, 传统种植业、养殖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 成为吸纳劳动力、促进就业的重要载体^[1]。基于这一现实背景,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建立欠发达地区分层分类帮扶制度”,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建立欠发达地区分层分类帮扶制度”“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等提出了明确要求^[2]。在相关政策部署下, 如何有效激活欠发达地区后发优势, 推动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发展, 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3]。

从理论维度来看, 欠发达地区是一个相对性概念, 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定义和明确的判定标准。虽

收稿日期: 2024-06-2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24ZDA052), 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项目“农村老龄化对农业发展韧性的影响研究”(GZC20231318)。

作者简介: 周子铭(1995—), 男, 黑龙江富裕人, 讲师, 研究方向为乡村振兴与农文旅发展。

通信作者: 高鸣(1989—), 男, 湖南汉寿人, 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E-mail: gaoming313@126.com。

然欠发达地区主要集中在中西部省份^①，但东部发达省份内部同样存在发展相对滞后的区域。根据不同的比较对象和判定标准，欠发达地区的划分也会存在差异。总体来看，与发达地区相比，欠发达地区普遍面临着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均收入差距明显、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共性问题。特别是在农业产业发展方面，受制于自然条件、历史因素和制度约束，往往陷入“要素结构落后—产业发展滞后—经济水平低下”的恶性循环^[4]。更为严峻的是，受到思维观念和文化惯性等因素制约，现代生产要素难以有效融入和赋能，仅依靠自身有限的产业基础，难以实现农业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后发追赶^[5]，导致深陷“要素结构处处落后”的发展困境^[6]。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发展阶段，欠发达地区如何抢抓农业产业发展的战略机遇，打破制约生产资料积累和配置的一系列约束？通过学习借鉴典型国家的成功经验，构建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帮扶的长效机制成为农业产业发展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学术界对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发展问题已开展了广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产业发展困境研究。学者们指出，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往往存在主导性失衡、管理效率低下、配套资金不足和生态负外部性等突出问题^[7-8]，同时也面临经营性资产被资本或精英俘获的发展困境^[9]。二是产业发展滞后的成因研究。研究表明，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发展困境主要源于历史性约束条件，如交通闭塞、地形复杂、生态环境脆弱等结构性因素^[10]。

既有研究为本文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但仍存在以下局限：一是现有研究多聚焦产业发展的普遍性问题，缺乏对欠发达地区特殊情境的深入分析；二是关于构建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帮扶长效机制的系统性研究相对不足，且国际经验的梳理和总结仍有待深化。基于此，本文从外部阻隔、内生困境、环境约束和市场壁垒四个维度构建分析框架，系统剖析中国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通过比较研究美国、日本和英国等典型国家的实践经验，从生产资料积累、资源配置效率和产业收益分配三个视角总结国际经验；提出构建包含基础保障机制、技术赋能机制、产业引领机制和市场拓展机制在内的长效机制体系，为推进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2 中国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发展的现实挑战

长期以来，中国农业产业发展存在明显的区域非均衡性特征。发达地区依托其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体系、先进的技术支撑平台和良好的营商环境，在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附加值提升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尽管国家通过政策倾斜和资金投入不断优化资源空间配置，使区域发展差距逐步缩小，但以脱贫地区为代表的欠发达地区仍面临农业产业规模效应不足、价值链延伸有限等发展难题^[11]。从现实制约因素来看，欠发达地区的农业发展不仅受限于自然条件约束，还面临着结构性发展瓶颈，难以突破传统农业发展模式形成的路径依赖。尤其是在公共服务供给、技术创新能力、生态环境约束和市场准入条件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亟须构建可持续的农业产业发展新模式。

2.1 外部阻隔：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历史原因和地域差异导致的交通和信息障碍是制约农业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欠发达地区普遍面临产业基础薄弱、公共服务短板突出的困境。从企业分布来看，全国 500 强农业企业落地在东部地区的有 271 家，占总数的 54.20%，而西部地区仅有 86 家，不足总数的 20%^②。此外，欠发达地区通常与农产品消费市场相隔很远，交通可达性差，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且使用率低，不完善的交通、仓储和物流设施影响了农产品的市场流通效率，进一步降低了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2022 年数据显示，西部地区的青海、新疆和西藏高速公

① 《全国人大代表魏后凯：欠发达地区政策应常态化》，https://www.peopleweekly.cn/html/2024/renminzhoukan_0416/204599.html。

② 《2022 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分析报告（一）——基于中国农业企业的调查》，https://tech.gmw.cn/2022-12/28/content_36262931.htm。

路网密度均小于 100 千米/万千米²，而东部地区的广东、浙江已超过 500 千米/万千米²^①。从不同区域来看，2020 年中国东、中、西部地区村庄主干道路全部完成硬化的行政村占比均在 85% 以上，但东北地区占比仍不足 60%^[12]。欠发达地区不发达的道路网络和物流系统使得农产品往往难以高效地流入市场，导致要素积累和再投入水平远低于发达地区，突破产业发展瓶颈制约的能力相对不足。以 2023 年数据为例，从产值上来看，青海省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为 208.3 亿元，不及浙江省同行业增加值的 10%^②。

2.2 内生困境：技术缺口与人才流失并存

提升农业产业发展水平是一项综合性强、涉及面广的系统性工程，需要汇聚生产、物流、销售等多领域人才。然而，欠发达地区正面临人才流失与技术缺口的双重挑战，严重制约了农业产业的转型升级。具体来看，受区域发展势差影响，高素质劳动力持续外流，关键技术主要依赖外部输入，导致本地农业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13]。从第六次、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人口占比数据来看，2020 年东部地区人口增长了 2.15%，而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分别下降了 0.79%、0.22% 和 1.20%。从流动人口的户籍分布来看，2000—2020 年，农村户籍人口流动到城镇地区占流动人口的比例由 52.2% 提升至 66.3%，人口的加速流出加剧了人力资本流失和基础设施低效利用的恶性循环。以四川省 39 个欠发达区县为例，其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全省平均水平的 3/4，而返贫监测的人口和户数比例分别占全省的 53% 和 45%。此外，长期依赖低技术水平的产业发展模式，不仅削弱了本地农业价值链提升的重要驱动力，也降低了农业产业发展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导致定价权和分配权逐渐被削弱，农业产业最终陷入“低端锁定”的发展困境^[14]。

2.3 环境约束：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失衡

土地密集型的大宗农产品生产销售对自然资源禀赋和市场条件等具有高度依赖性。以全国 14 个曾经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为代表的欠发达区域，主要分布于中西部及边远山区，受地形地貌复杂、耕地细碎化等自然条件制约，农业生产效率与产品流通能力明显受限。同时，由于集体经济积累不足或能人带动效应缺失，农业产业结构仍以传统种植业和初级农产品销售为主导，资源深度开发和价值转化能力薄弱，农业产业的脆弱性较为突出且风险抵御能力不足。

从生态环境视角来看，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普遍面临资源消耗与生态保护加压的双重矛盾。以新疆为例，全国第六次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监测数据显示，该区域荒漠化的土地面积达 106 万千米²，占自治区面积的 64.18%；沙化土地面积 74.68 万千米²，超过 90% 的区县遭受沙化冲击。此外，2022 年仅西部地区便有超过 220 万千米² 的水土流失，占全国水土流失总面积的 84%。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欠发达地区在承担生态保护重任的同时，也面临着发展机会成本与生态服务价值的双重损失。然而，受传统发展模式制约，欠发达地区尚未建立起有效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难以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农业产业发展动能。地区环境承载能力与产业发展布局的严重错配，导致生态资源开发利用不足与农业产业发展滞后问题并存。因此，探索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农业产业发展新路径，已成为推动欠发达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

2.4 市场壁垒：准入受限与营销渠道不足

市场准入受限和营销渠道不足是制约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发展的关键瓶颈。受传统观念束缚和发展需求不足的双重影响，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普遍存在初级化特征，市场主体信心不足，农产品销售渠道不畅，难

① 《2022 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分析报告（一）——基于中国农业企业的调查》，https://tech.gmw.cn/2022-12/28/content_36262931.htm。

② 同①。

以形成具有集群效应的经济生态链, 农业产业在根植性、引领性和融合性方面的优势尚不突出。

具体而言, 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面临的市场壁垒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 欠发达地区的市场竞争意识相对薄弱, 产品品牌建设和市场推广能力不足, 农户难以拓宽销售渠道或提高农产品价格^[15]。农产品往往以原料、原粮的形式出售, 加工环节盈利能力较低。即便能够进行初步加工, 由于市场准入限制和销售渠道匮乏等问题, 收入提升的空间依然有限^[16]。第二, 欠发达地区农产品生产仍以分散的小农户为主, 生产组织化程度和经营活力相对较低, 农产品质量标准化程度不足, 难以满足市场对产品品质和规格的更高要求。此外, 发达城市对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发展要素的需求刚性不强, 尤其是发达城市的市场需求趋于饱和时, 部分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极易陷入竞争激烈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第三, 欠发达地区产业融合层次较浅, 难以将产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产业发展大多仍停留在较为初级的阶段, 农业产业链普遍较短, 与农户利益联结紧密的合作模式推广有限^[17]。此外, 冷链物流装备不足且区域分布失衡, 导致部分区域优势农产品面临仓储运输成本高、价格竞争力不足等困境。

3 典型国家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帮扶的主要做法

在梳理典型国家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帮扶的主要经验时, 本文选取美国、日本和英国作为典型案例, 考虑的是上述国家在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发展中的代表性及其对中国借鉴意义。具体来看, 美国依托其自然资源禀赋优势, 在土地集中度较高的欠发达地区推行大农场模式。通过规模化经营、机械化作业和现代化管理, 有效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 为中国部分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具备规模化潜力的欠发达地区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发展路径。日本则针对其资源约束条件, 在耕地细碎化特征明显的欠发达地区探索出精细化的农业发展道路。通过土地改良、技术创新和集约化经营, 有效克服了耕地分散等自然条件限制, 实现了农业的高质高效发展, 对于中国丘陵、山地等耕地细碎化程度较高的欠发达地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英国在推动欠发达地区农业转型过程中, 注重构建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协同发力的政策体系。通过精准化的政策帮扶措施, 深度挖掘农业的多功能价值, 成功推动了北部山区等欠发达地区的农业现代化进程。尽管上述三国在自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与中国存在一定差异, 但其在突破自然条件约束、转变传统发展模式、优化生产要素配置等方面所采取的政策措施, 对中国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长效发展机制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3.1 美国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帮扶的主要做法

19 世纪初期的美国西部相较于东北部和中部, 仍属于欠发达的地区。该地区自然资源以矿产为主, 交通基础设施较为落后, 人口密度也相对较低。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西部欠发达地区从自给自足的拓荒农场逐步转型升级为高度商业化和专业化的现代农场, 成功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产业的发展转型, 相关经验对中国东北、新疆等欠发达地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美国政府通过加强灌溉系统、道路和仓储设施建设,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并提高物流效率, 增强了农户的市场接入能力。在此基础上, 各州政府采取了差异化和相对独立的税收政策, 通过较低的税率或免税政策吸引私人企业的投资, 进一步促进了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二是深入实施职业农民培育计划。美国欠发达地区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 得益于科学技术和人力资本的深入赋能。政府积极吸引技术人才集聚, 鼓励人力资源向欠发达地区有序流动。同时, 美国高度重视信息化在农业产业中的应用, 鼓励农场主学习和掌握无人机驾驶、科学选肥施肥等现代农业技术, 推动了精准农业的发展和推广。在实现农业降本增效的基础上, 也间接提升了欠发达地区的人力资源水平和发展能力。三是重视优化市场资源配置。美国以规模化的家庭农场为核心, 通过完善的市场体系优化资源配置, 推动生产、加工和销售的一体化, 促进了农业产业集群的建设和发展。在生产、加工和销售环节, 均呈现出明显的集群化特点。此外, 美国通过实施本地食品促销计划 (LFPP) 和农民市场促销计划 (FMPP), 有效提升了小农户的市场对接能

力,大幅拓宽了欠发达地区农产品的营销渠道。

3.2 日本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帮扶的主要做法

日本北海道等欠发达地区普遍面临倾斜坡地多、农业用地狭小且分散的地理条件限制。同时,这些地区与主要经济中心和市场中心的空间距离较远,加之交通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严重制约了农业产业的现代化发展。中国山区及丘陵地区的农业用地同样面临分散和低效利用的问题,且交通和市场接入能力较弱,制约了农业产业的发展。为破解上述发展瓶颈,日本在推进乡村产业发展中,创新性地采用了“地域主义”的内生式发展模式和社会投资驱动的外生式发展模式相结合的政策框架,主要做法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健全系统完备的法制保障体系。日本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针对性强、实效性高的政策法规,有效引导各类产业要素向欠发达地区集聚。其中,《山村振兴法》和《过疏地区振兴法》的实施显著促进了城市的人口回流,有效缓解了农业产业发展面临的农村地区人口过疏化和劳动力老龄化等结构性矛盾。同时,《农业基本法》的推行促进了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规模化经营水平,显著提升了区域农业产业的竞争优势和发展潜力。二是夯实产业发展的人才基础。为缓解中心城区人口过密和功能过度集中等问题,日本政府通过税收减免、搬迁补贴等人才激励措施鼓励人口流动。例如,对从京都 23 区等大城市返乡的居民,政府提供最高 100 万日元的搬迁补贴。此外,政府针对有意愿从事农业产业的人员,系统开展农业机械操作、现代农业技术培训等专业培训课程。同时,为减轻农户在职业转型期间的经济压力,政府提供最长两年的资金支持,每年最高补助额度可达 150 万日元,有效促进了农业从业人员的专业化水平提升。三是强化农协组织的引领带动功能。日本农协凭借其综合性服务优势,在协调区域社会关系、指导农业生产实践和促进市场有效对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引领示范和辐射带动作用。在政府的政策引导下,农协遵循严格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成功实现了小规模农户的“弱者联合”,有效提高了农业产业的组织化程度,在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和推动区域品牌建设等方面成效显著,为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3.3 英国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帮扶的主要做法

英国作为现代农业发展的典范国家,其农业机械化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均居于世界前列,且农业产业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特征,其中畜牧业在总体农业产值中占有较大比例。然而,在英国的北部和西部山区等欠发达地区,受限于贫瘠的土壤条件、脆弱的生态环境以及有限的人均耕地面积,农业产业发展明显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中国西部山区和边远欠发达地区的农业发展存在诸多共性特征。基于此,深入分析英国政府在推动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发展中的政策实践,对于中国类似地区的农业产业振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是高度重视政策顶层设计。英国在推动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发展过程中,着力构建了系统化的政策支持体系。政府通过设立专项政策支持资金,重点加强保障性制度建设和组织实施机制创新,为欠发达地区农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18]。在区域划定方面,政府特别注重地理空间连续性原则,切实保障农业产业规划的统一性和管理的有效性。其中,“欠发达地区支援计划”作为重要的政策抓手,政府为农业低产出区域提供每公顷 25~200 英镑的差异化现金补贴,有效促进了区域间农业产业的均衡协调发展^[19]。二是推动农业产业规模化。为提高农业规模化水平,英国政府通过法律手段积极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根据 1967 年修订版《农业法》的相关要求,政府承诺负担小规模农场合并成本的 50%。对于主动退出经营的农场主,政府提供最高 2 000 英镑的财政补助或每年最多 275 英镑的终身年金。三是拓展农业产业的多元功能。面对传统农业生产模式的局限性,英国政府着力挖掘农业的多维价值,拓宽农业产业发展路径。作为发展乡村旅游的先驱国家之一,英国通过系统整合农事教育、生态保育、文化传承等多重功能,率先构建了“农业+”的融合发展模式。特别是在城市周边的欠发达地区,通过打造集农业生产、生态观光、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复合型农业体系,有效拓展了产业增值空间,释放了区域发展潜力,为农业产业转型升级注入了新

动能。

4 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帮扶的国际经验总结

加速农业产业发展的关键在于生产要素的积累与优化配置，以及建立科学合理的收益分配机制^[20]。具体来看，第一，生产要素的积累是农业产业发展的基石。无论是资本、技术还是劳动力等要素的持续积累，都直接决定了农业生产的潜力和规模。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生产资料积累不仅是农业生产能力提升的前提，更是突破资源约束、实现产业升级的必要条件。第二，生产资料的优化配置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关键。在欠发达地区，农业资源的配置效率往往受限于分散的小农经济结构和制度性障碍，制约了农业产业整体效益的提高。第三，构建科学合理的收益分配机制是农业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只有当相关利益主体能够获得公平且具有激励性的回报时，其参与意愿和投入动力才能被充分激发。对欠发达地区而言，科学合理的收益分配机制不仅能有效平衡产业链上下游的利益关系，还能增强农户与企业之间的合作黏性，为农业产业发展提供持续的内生动力。由于自然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基础差异，不同国家和地区在推进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发展方面采取了各具特色的帮扶方式和实践路径。本部分主要梳理典型国家在生产资料积累、资源配置效率和产业收益分配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图 1），以期为中国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发展提供可供借鉴的经验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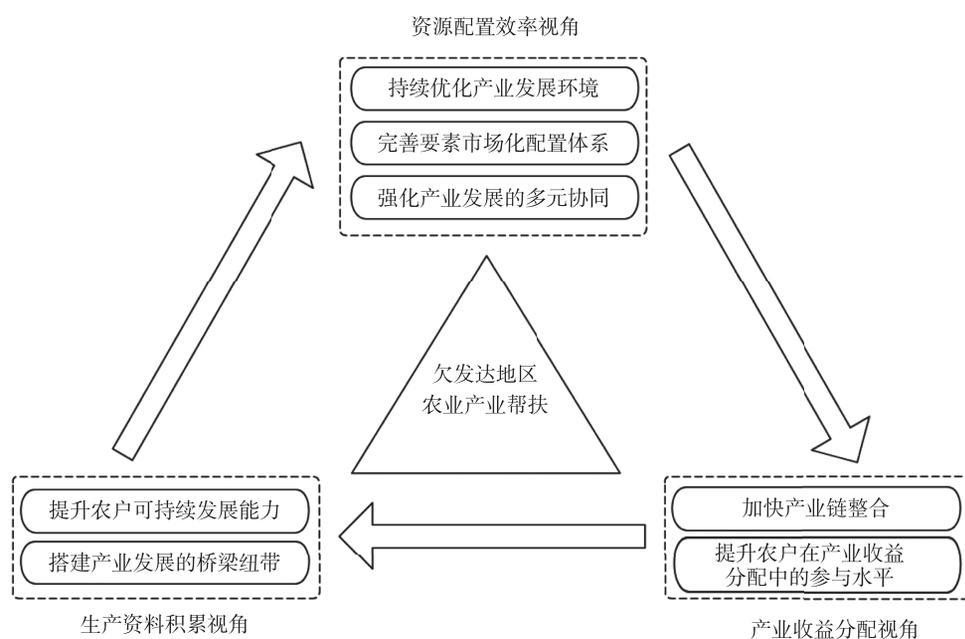


图 1 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帮扶的国际经验总结

4.1 基于生产资料积累视角的经验总结

农业产业发展高度依赖生产要素的有效投入，然而欠发达地区普遍面临优质农业生产资料存量有限且结构相对落后的困境，加之风险规避机制不完善、信贷保险市场失灵，以及获取信息和资源的渠道匮乏^[21]，农业产业往往陷入要素“低端锁定”的发展困境^[22]。因此，在充分挖掘地方特色、盘活本土资源的同时，亟须加强制度优化、资源配置和思想引领等方面的系统性支持。从生产资料积累的视角来看，国际经验表明，立足于区域特点、民族特色等资源优势，通过以提高农户优质生产资料积累能力为核心的帮扶措施，能够有效促进农业产业转型升级。

具体而言，相关帮扶措施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着力提升农户可持续发展能力。在技术水

平相对较低的欠发达地区,生产效率普遍不高且提升空间有限。为增强小农户的经营管理能力,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高度重视技术推广和农户发展能力建设,帮助农户学习和掌握现代农业技术,全面提高农业产业的发展水平。以日本为例,政府推行的《农林水产业地区活力创造计划》和《农业竞争力强化计划》,通过为小农户提供专项资金和技术支持,不仅有效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和市场竞争力,还成功引导了人才、技术等优质资源向欠发达地区流动,形成了良性的发展循环^[23]。另一方面,搭建产业发展的桥梁纽带。美国通过强化农业补贴政策,推行低成本的产业贷款,为符合条件的农业生产主体提供质优价廉的农业生产资料,有效缓解了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压力,促进了农业产业向规模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尽管高额的补贴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政府财政负担,并可能引发羊群效应导致的农户过度扩产和产能过剩等问题,但从长期来看,却能够有效提高农户生产资料积累和配置的能力,为农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4.2 基于资源配置效率视角的经验总结

生产资料等资源错配是制约传统农业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要素的高效配置和有序流动能够助推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24]。从国际经验来看,生产资料的高效配置可以通过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和强化产业发展的多元协同三条途径来实现。

第一,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环境。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具有重要的引导和调节作用,良好的政策环境能够有效刺激农业投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以日本为例,其利用多元化的帮扶资源,探索形成了多样化的帮扶模式。其中,“故乡税”政策通过“回礼品”机制,不仅促进了地方特色产业发展,还为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搭建了“走出去”的发展平台,提升了区域协同联动的水平,有效激发了地方特色产业的发展活力^[25]。第二,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美国在该途径上提供了有益借鉴,其绝大多数农场主依托市场机制进行要素的自由交换,不同市场主体能够平等地获取生产要素和参与市场竞争,实现了资源的科学配置和高效利用。英国在推动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发展时,主要采取的是区域均衡发展策略,以激励企业跨区迁移和经营便利化为基础。政府在这一过程中主要扮演市场服务者和信息提供者的角色,通过为企业和农户提供必要的市场信息、政策支持和便利服务,有效提升了要素配置效率。此外,英国政府通过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机制,不断优化和完善政府的财政支持制度,确保农产品生产和流通的顺畅运行。第三,强化产业发展的多元协同。合理的制度安排和组织形式能够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美国政府高度重视与社会组织的协同合作,政府为社会组织主导的项目提供资金配套,通过合作降低支持农业发展政策的执行成本。英国乡村保护协会(CPRE)的实践提供了另一范例,其成立的初衷便是为了合理控制城市扩张并保护传统乡村景观,通过政府补贴和资金支持,不仅为农业产业项目提供了广阔的实施平台,而且极大地增强了项目的覆盖范围和实施效果,有效释放了产业支持政策的“乘数效应”。

4.3 基于产业收益分配视角的经验总结

在欠发达地区,传统农户常被视为“弱小的多数”,面临农业资源与经济收益转化机制缺失的发展困境,亟须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产业发展模式。从产业收益分配的视角来看,国际上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主要体现在强化农户协作、鼓励发展联农带农的产业化项目等。针对资源禀赋和市场规模的区域差异,需要因地制宜创新农业产业的组织形式,将分散的小农户纳入社会化、组织化和市场化的产业体系中,充分激发市场的“涓滴效应”,推动企业通过更为市场化的机制发挥联农带农的作用^[26]。

第一,加快产业链整合是提高农业产业组织效率的关键。欠发达地区由于对工商资本的吸引力较为有限,更需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培育具有地方特色和市场竞争力农产品,有效推动农业产业的发展和振兴^[27]。日本整合农业产业链的经验表明,通过构建上下游紧密协作的产业联合体,能够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并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具体而言,日本注重集中优质资源,推动产业链向上下游延伸,并依托组织效率高的农协体系,提供涵盖农业生产、采购、销售和权益保障等全方位的社会化服务,从而有效提升了农业产业的

组织效率。第二，提升农户在产业收益分配中的参与水平。欠发达地区农户由于分散性高和小规模经营，往往处于产业链的弱势地位，难以在收益分配中获得合理回报。因此，推动合作模式创新，建立农户与企业的有效联结机制，提高农户的组织化程度，是增强其在产业收益分配中的话语权和收益能力的重要途径。日本的经验表明，通过农业合作社等组织形式，将分散的小农户整合到统一的生产、加工、销售体系中，不仅能够提高生产效率，而且确保农户能够分享产业链各环节的增值收益。尤其是在资源分配、价格谈判等关键环节，农业合作社通过凝聚集体力量增强了农户的议价能力，有效保障了农户在产业收益分配中的公平地位。

5 构建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帮扶长效机制的政策启示

基于对美国、日本和英国等发达国家农业产业帮扶经验的系统性梳理，本文认为各国在帮扶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发展方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支持模式。相较于美国的资源型农业、日本的精细农业和英国的集约化农业，中国农业产业最大的优势在于其多元化的发展模式。不同地区在农业生产方式、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等方面各具特色，为欠发达地区提供了灵活多样的产业发展路径。为有效应对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发展面临的外部阻隔、内生困境、环境约束和市场壁垒等多重挑战，本部分主要从基础保障、技术赋能、产业引领和市场拓展四个维度，尝试构建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帮扶的长效机制。

5.1 基础保障机制：加快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

基本公共服务作为生产和生活所需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通过提高生产效率、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构成了推动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发展的基础性保障机制。基于此，应以公共资源配置均衡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导向，优化欠发达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空间布局和供给结构。一是优化农业产业相关的基础设施空间布局。重点完善县域批发市场、商品集散中心和物流基地的网络化布局，提高运输服务网络的整体效率，有效降低农产品运输成本。同时，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鼓励和支持多元化主体参与公共服务提供，发挥骨干企业的示范引领作用，提升服务效率和质量。二是深入推进公共服务资源的区域共享。提高公共服务资源的配置效率，特别是在产业发展的相关配套服务方面，坚持以民生为本拓展服务范围和内容。具体而言，应加强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建设，提升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质量。同时，完善“互联网+医疗”和“互联网+教育”的发展模式，通过远程医疗和在线课堂等数字化手段，推动优质医疗和教育资源的区域均衡分配。三是统筹推动公共服务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提高政策的协同性和有效性，促进生产性和生活性公共服务的双向赋能和良性互动，引导相关要素资源在空间上实现更加均衡、顺畅地流动。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更好地匹配资源供需，缓解农业产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提高产业发展和公共服务的智能化管理水平。

5.2 技术赋能机制：培育壮大高素质农民队伍

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发展需遵循自然规律和农业产业基础，与区域营商环境和市场需求等相适应，在顶层设计的指导下积极调整和创新产业发展模式。一是建立健全技术服务体系。构建层次分明、类别清晰的技术培训体系，重点突破欠发达地区要素分散、观念滞后等制约技术进步的结构障碍。通过提升农户的现代化经营理念和技术应用能力，促进农业技术的创新与扩散，有效化解小农分散经营与现代农业规模化发展之间的矛盾^[28]。二是完善人才有序流动机制。构建有利于返乡能人就业创业的长效机制，依托乡情纽带、政策激励和制度保障等多重措施，营造内育外引、选贤任能的良好发展环境，吸引具备专业知识、乡土情怀、管理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回流，为当地农业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三是推进先进适用技术落地应用。针对欠发达地区特殊地形地貌，研发和推广适用型农机装备，促进机械化和智能化装备的深度融合，降低劳动强度和生产成本。同时，探索智慧农业技术的多元化应用场景，推动种植业向畜牧业、山地农业的延伸发展，实现农

业全产业链的现代化转型。

5.3 产业引领机制：因地制宜推动生态产业化发展

欠发达地区的生态环境脆弱，耕地资源较为稀缺，传统农业产业发展模式往往容易导致生态失衡问题加剧。为了突破发展困境，亟须构建因地制宜的生态产业化发展机制，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协同提升。一是构建精准化的政策支持体系。针对欠发达地区的自然资源禀赋和生态环境特征，制定差异化的农业产业政策框架，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产业发展的生态效益。在支持传统农业向生态农业转型过程中，政策设计应着重关注绿色产业和生态农业项目的精准扶持，推动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与绿色发展，防范过度开发风险。二是完善示范试点机制。选择具有典型生态资源禀赋的地区开展绿色农业项目试点，探索符合区域生态环境特征的产业发展模式。政策层面应建立健全激励机制，鼓励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优先发展生态友好型产业，尤其是在项目审批和资源配置时，优先考虑环境友好型项目，为其他地区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模式。三是创新生态用地保障机制。针对生态资源紧张地区，探索构建灵活的土地调剂和用地保障机制，优先满足绿色农业和生态产业项目的用地需求。通过优化土地流转政策设计、实施差异化的税费减免、完善土地使用规划等措施，降低绿色产业的用地成本。同时，加强土地规范流转的法律保障，建立土地使用生态评估机制，确保土地开发利用符合生态环保要求，防止土地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的生态风险。

5.4 市场拓展机制：持续夯实农业全产业链发展水平

为统筹推进区域农业产业协调发展，需强化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产业协作，构建优势互补的产业布局，提升产业链的现代化水平。具体来看，市场拓展机制的构建应着重以下三个维度。一是加快推动农产品市场化进程。引导资本积极投入农业产业发展，帮助农民增强市场参与意识和能力。通过构建完善的农产品流通体系，整合电子商务平台、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建立与消费市场的有效链接，提高农产品的市场渗透率和流通效率。以核心企业作为基本依托和枢纽，有效整合上下游资源，积极推进主导产业价值链的优化升级。同时，推进标准化生产体系建设，完善质量认证机制，培育区域特色品牌，进一步提升农产品的市场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二是充分挖掘区域产业特色。欠发达地区受地形地貌、地理区位和气候条件等因素制约，规模化种植和养殖业发展受限，应依托县域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通过系统整合自然、人文、历史等资源要素，为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拓展生存和发展空间，推动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和发展优势的转化。三是实施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支持欠发达地区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业产业，提升农产品加工技术水平和装备研发能力，推动初级农产品向高附加值的精深加工产品转型升级。通过建设农产品加工园区，培育产业集群，吸引优质加工企业集聚，推动区域农产品加工产业链优化和升级。

6 小结

相较于经济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的农业产业发展长期受到地理区位偏远、自然资源匮乏等多重条件的制约。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随着一系列政策的扎实推进，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发展成效显著。然而，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目标，仍需构建科学合理的发展模式，系统性地防范和化解潜在风险，探索推动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发展的可行路径。本文在分析中国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发展现实挑战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美国、日本和英国三个典型国家支持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发展的主要做法，并从生产资料积累、资源配置效率和产业收益分配三个视角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经验总结。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农业产业发展实际，从基础保障机制、技术赋能机制、产业引领机制和市场拓展机制四个维度提出了构建欠发达地

区农业产业帮扶长效机制的政策启示。当然，推动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要依赖资源的持续投入，更需要不断优化产业发展模式和政策支持体系，既非一朝一夕之功，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应坚持系统思维，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

参考文献

- [1] 白云丽, 曹月明, 刘承芳, 等. 农业部门就业缓冲作用的再认识: 来自新冠肺炎疫情前后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证据 [J]. 中国农村经济, 2022 (6): 65-87.
-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 [J]. 中国农民合作社, 2025 (3): 5-10.
- [3] 张红宇. 建设农业强国的理论逻辑: 基于农业产业属性的观察与研究 [J]. 改革, 2024 (2): 121-130.
- [4] 蒋辉, 蒋和平. 国外对欠发达地区农业发展的扶持: 日本经验与启示 [J]. 世界农业, 2013 (12): 17-21, 39.
- [5] 朱竑, 陈晓亮, 尹铎. 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 欠发达地区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阶段、路径与制度研究 [J]. 管理世界, 2023, 39 (8): 74-91.
- [6] 樊纲. “发展悖论”与发展经济学的“特征性问题” [J]. 管理世界, 2020, 36 (4): 34-39.
- [7] 葛宣冲. 欠发达地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理论内涵与实践创新 [J]. 现代经济探讨, 2023 (12): 117-125.
- [8] JOHNSTON A, PROKOP D. Peripherality and university collaboration: evidence from rural SMEs in the UK [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1 (2): 298-306.
- [9] 张晴羽, 周密. 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入市发展的机理与困境: 基于欠发达地区 D 县的案例调查 [J]. 农业经济问题, 2024 (11): 20-32.
- [10] 刘小峰, 彭扬帆, 徐晓军. 选优扶强: 老少边区特色农业“一县一业”格局何以形成: 盐池滩羊的纵向案例研究 [J]. 管理世界, 2023, 39 (7): 46-63.
- [11] 黄增, 高鸣. 推动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发展的内在逻辑、现实困境与推进策略 [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4, 45 (3): 345-354.
- [12] 高鸣, 魏佳朔. 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历史方位和实现路径 [J]. 中国软科学, 2022 (8): 45-57.
- [13] 樊士德, 朱克朋. 劳动力外流对中国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福利效应研究: 基于微观调研数据的视角 [J]. 农业经济问题, 2016, 37 (11): 31-41, 110.
- [14] 王海杰, 宋姗姗. 基于马克思价值链理论的欠发达地区产业发展研究 [J]. 当代经济研究, 2014 (4): 9-14.
- [15] 李珍刚, 张晴羽. 论欠发达地区资本下乡与农民市场意识的养成 [J]. 农村经济, 2020 (4): 98-106.
- [16] ARSLAN C, GREGG D, WOLLNI M. Paying more to make less: value degrading in the coffee value chain in eastern Uganda [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24, 106 (1): 96-117.
- [17] 高鸣, 周子铭. “千万工程”经验赋能乡村产业发展的理论逻辑、现实基础与行动路径 [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24 (2): 1-15.
- [18] 武小龙. 英国乡村振兴的政策框架与实践逻辑 [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19 (6): 23-33.
- [19] 周应华, 朱守银, 罗其友, 等. 英国农村区域协调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8 (8): 272-279.
- [20] 黄祖辉. 改革开放四十年: 中国农业产业组织的变革与前瞻 [J]. 农业经济问题, 2018 (11): 61-69.
- [21] D'EXELLE B, MUNRO A, VERSCHOOR A.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behaviour and contingency: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Uganda [J]. World Development, 2024, 173: 106427.
- [22] 吴彬, 徐旭初, 徐菁. 跨边界发展网络: 欠发达地区乡村产业振兴的实现逻辑: 基于甘肃省临洮县的案例分析 [J]. 农业经济问题, 2022 (12): 59-72.
- [23] 胡凌啸, 周应恒. 提升小农竞争力: 日本农业新政策的指向及启示 [J]. 中国农村经济, 2018 (2): 126-138.
- [24] 葛宣冲, 杨丽溶. 欠发达地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治理现代化: 逻辑定位与实践指向 [J]. 经济问题, 2024 (4): 99-105.
- [25] 郭佩, 刘莉. 日本乡村振兴的别样手段: 故乡税制度的实施路径、效果及争议 [J]. 世界农业, 2022 (8): 41-50.
- [26] 林万龙. 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构建 [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41 (4): 21-28.

- [27] 张季风. 乡村振兴视阈下的城乡融合发展: 日本的实践与启示 [J]. 中国农村经济, 2022 (12): 124-138.
- [28] 袁俊林, 赵跃龙, 魏昊. 农民合作社能提升农户自主发展能力吗?: 来自中国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的证据 [J]. 世界农业, 2023 (1): 99-114.

Experiences and Insights in Building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Helping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in Underdeveloped Regions

ZHOU Ziming GAO Ming

Abstract: Promoting agricult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underdeveloped regions is a key path to achieving bottom-up suppor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current realities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identifies four major challenges faced by agricultural industries in underdeveloped regions: insufficient provis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the coexistence of technological gaps and talent loss, imbalances betwee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rictions on access and insufficient marketing channels. From a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policy practi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the United Kingdom in promoting agricult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underdeveloped regions. It summarizes the main experiences of supporting agricultural industries in these regions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accumulation of production materials,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and distribution of industrial benefits.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innovatively constructs a four-dimensional analytical framework that includes basic guarantee mechanisms,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mechanisms, industry-leading mechanisms, and market expansion mechanisms. This framework provides systematic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supporting agricultural industries in China's underdeveloped regions.

Keywords: Underdeveloped Regions; Agricultural Industry;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Support Mechanisms

(责任编辑 卫晋津 张雪娇)

脱贫劳动力就业现状、问题及常态化帮扶机制构建

◆ 种 聪¹ 李祺临²

(1.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北京 100810;

2. 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 北京 100029)

摘要: 脱贫攻坚全面胜利后, 如何有效促进脱贫人口实现充分就业, 助力欠发达地区经济持续增长, 是目前中国“三农”领域面对的重要问题。本文采用微观调查数据, 对2019—2022年脱贫劳动力的就业状态及特征进行深入分析, 梳理当前就业的关键问题, 从建立动态监测机制、优化提升就业服务机制、建立就业内生动力提升机制、优化就业兜底保障机制等方面构建常态化帮扶体系, 帮助脱贫劳动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关键词: 脱贫劳动力; 欠发达地区; 就业特征; 常态化帮扶

DOI: 10.13856/j.cn11-1097/s.2025.09.002

1 引言

就业是民生之本, 是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需要长期面对的现实难题, 也是党和政府不断探索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而脱贫劳动力就业是重中之重。2023年, 脱贫劳动力务工规模达到3 396.9万人^①。务工收入已经成为脱贫劳动力的主要收入来源, 脱贫农户中, 工资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接近70%^②。脱贫劳动力稳定就业不仅是脱贫家庭的生活保障, 也是最直接有效激发内生动力的方式, 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 加强困难群体就业兜底帮扶”。202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进一步强调, 要“持续加强产业和就业帮扶”“稳定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这也是后脱贫时期防范脱贫人口返贫、有序推进乡村振兴的必要之举。但是现实中, 脱贫劳动力由于受到自身和周围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 在就业市场中难免遇到比一般农村劳动力更多的挑战。因此, 在当前阶段亟须深入分析脱贫劳动力就业特征, 提炼就业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并提出长效帮扶措施。

脱贫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作为新时期就业工作的重要方面, 受到诸多领域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已有研究中与其直接相关的问题, 主要包括脱贫劳动力就业政策和模式^[1-8]、脱贫人口预防返贫^[9-13], 以及农村劳动力就

收稿日期: 2024-06-24。

基金项目: 共青团中央青少年发展研究课题“返乡大学生投身乡村振兴情况调查研究”(23JH077)。

作者简介: 种聪(1990—), 男, 博士, 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农村劳动力收入与就业。

通信作者: 李祺临(1993—), 男, 博士, 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与居民收入, E-mail: lzhenl_ruc@163.com。

① 数据来源: <http://www.news.cn/20240123/f0d6055cbca4ed885d07bd1d40ce27d/c.html>。

② 数据来源: 2022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

业^[14-23]三个方面。第一,在脱贫劳动力就业政策和模式角度的研究中:一部分文献对国家就业扶贫相关政策的发展进行整理和分类,并将其进一步理论化^[1-2];另一部分则是对政府当前推行的各项就业稳定帮扶模式进行梳理^[3]。也有学者基于现有就业扶贫政策以及反馈结果,为就业政策和就业模式的完善提供建议^[4-8]。第二,在脱贫人口预防返贫视角的研究中:一方面,部分学者着力分析当前脱贫地区的返贫风险^[9],以及脱贫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10];另一方面,则是从脱贫人口的增收和帮扶政策方面提供建议^[11-13]。第三,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研究相对丰富,也从更广泛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讨论。其中,国外部分研究主要关注了发展中国家农村就业政策的实践效果与不足,包括项目可持续性较差、政策效果较为有限等^[14-15]。国内相关研究则更加侧重于分析当前影响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各类因素^[16-18],刻画农村劳动力就业特征^[19-21],以及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所面对的各项挑战^[22-23]。

通过对以上各类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已有研究虽然从多个角度对当前促进劳动力就业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供了相应政策建议。但是,现有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之处:其一,当前对欠发达地区人口就业的研究更多地侧重于对政策梳理和论述,较少从脱贫劳动力这一就业主体的角度进行分析;其二,对于农村劳动力就业方面的研究较少能够聚焦脱贫人口,而脱贫人口由于初始条件或资本水平较低,在参与就业过程中可能遇到更多的困难,因此需要给予特别关注。经由以上分析,本文基于微观视角,利用2019—2022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从个人特征与外出就业特征两个角度,刻画了脱贫劳动力的禀赋情况、就业选择情况以及就业特点,进而分析提炼其在参与就业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现实困难和约束,最终针对性地对相关政策措施的完善提出建议。期望通过本文研究,可以更好地帮助脱贫劳动力实现稳定就业和持续增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2 脱贫劳动力就业帮扶政策演变和特点

党和政府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均开展了对于困难群体的就业帮扶政策,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更是对脱贫人口的就业帮扶力度和准度,实现了稳岗就业的目标,在防范大规模因就业返贫工作上也取得了显著成效。本文通过梳理已有帮扶政策的演变,总结脱贫劳动力就业帮扶的特点,为常态化就业帮扶提供政策依据。

2.1 出台帮扶政策

本文以促进脱贫劳动力就业为标准,依照时间顺序,系统梳理了近年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央一号文件以及国家层面出台的就业帮扶的重要政策和举措(表1、表2)。这些政策既包括中央文件和会议报告对就业帮扶提出的要求,也包括各部门出台的就业帮扶具体举措。

表1 历年中央一号文件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对脱贫劳动力的就业帮扶政策

年份	中央一号文件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2021	持续做好有组织劳务输出工作; 对符合条件的就业困难人员进行就业援助; 吸纳更多脱贫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就地就近就业	抓紧完善和落实监测帮扶机制,加强产业和就业帮扶,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2022	做好省内转移就业工作	把脱贫人口和脱贫地区的帮扶政策衔接好、措施落到位
2023	注重扶志扶智,聚焦产业就业; 实施防止返贫就业攻坚行动,确保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稳定在3 000万人以上	提高产业和就业帮扶实效,推动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
2024	推进防止返贫就业攻坚行动	

表 2 国家层面出台的重要政策和举措

年份	政策文件和举措	主要内容
2016	《关于进一步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指导意见》	组织劳务协作，西部地区摸清底数，掌握建档立卡户中有就业意愿和能力的未就业人口信息，与东部劳务对接
2018	《关于大力实施乡村就业创业促进行动的通知》	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工程
2020	《关于进一步用好公益性岗位发挥就业保障作用的通知》	动态调整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标准，及时将受疫情影响失业人员、残疾人员、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等各类就业困难人员纳入援助对象范围
	《关于印发〈扩大返乡留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规模实施方案〉的通知》	回归农业稳定一批；工程项目吸纳一批；创新业态培育一批；扶持创业带动一批；公益岗位安置一批
	《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促进农民增收的通知》	大力扶持贫困户劳动力就业增收。加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对贫困群众务工就业的支持；临时增设防疫岗位要优先安排贫困户劳动力就业；加快推进扶贫车间恢复生产，吸纳更多贫困户劳动力就业，推动加大有组织劳务输出力度，定向投放就业岗位
2021	《关于加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帮扶工作的意见》	保持重点帮扶县脱贫人口每年就业规模稳定。推进劳务输出，培育劳务品牌，促进就近就业，提升公共就业服务，加大就业补助资金；强化技能提升
	《关于切实加强就业帮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	稳定外出务工规模；支持就地就近就业；健全就业帮扶长效机制
	《关于进一步坚守“赈”的初心充分发挥以工代赈政策功能的意见》	鼓励农村低收入人口参与政府投资的工程项目，开展就业技能培训，实现就近就业
2022	《关于做好 2022 年脱贫人口稳岗就业工作的通知》	按照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要求，帮助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脱贫人口实现就业，帮助已就业脱贫人口稳定就业
2023	《关于开展防止返贫就业攻坚行动的通知》	努力促外出、拓就近、稳岗位、保重点，全力稳定 3 000 万人以上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和务工收入，坚决守住不发生因失业导致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关于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做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工作的意见》	通过产业发展、劳务输出、车间吸纳、以工代赈等方式进行就业帮扶
	《关于进一步做好促进脱贫人口持续增收工作的通知》	推动脱贫人口稳岗就业。东部地区要深化劳务协作，把脱贫人口稳在企业、稳在当地，稳住岗位和收入。中西部地区要开展有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劳务输出组织化程度，拓宽就业渠道，做好脱贫人口省内就业和就地就近就业
202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召开脱贫人口稳岗就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围绕外出就业和就近就业双向发力，健全脱贫人口就业岗位开发机制。实现人员信息入库、服务站入村、就业服务入户。强化职业技能培训，激发脱贫人口内生发展动力

2.2 就业帮扶政策的主要特点

从就业帮扶的范围来看，实现了从普惠帮扶向重点群体精准帮扶转变。其中，对有劳动能力的开展开发式就业帮扶，提升内生发展动力，对劳动能力较弱的开展兜底式就业帮扶。此外，2023 年、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多次强调了对超龄、高龄农民工提供就业帮扶。

从就业帮扶的地域来看，实现了从鼓励以外出务工为主，向以外出务工为主、就近就业为辅转变。已有政策在提升劳务输出水平、培养知名劳务品牌的基础上，更加注重降低脱贫劳动力就业成本，通过产业发展扩大本地就业渠道，并充分发挥以工代赈、灵活就业、公益性岗位等政策的作用，多措并举，帮助脱贫劳动力实现就地就近就业。

从就业帮扶的举措来看，实现了从单一化帮扶向体系化帮扶转变。对脱贫劳动力就业帮扶措施的方式和办法日

趋多样化,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就业帮扶体系。聚焦脱贫劳动力的内生发展动力提升,开展扶志和扶智攻坚行动。

3 脱贫劳动力的就业特征和趋势

促进稳定就业是保障脱贫劳动力生存发展、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和稳定的基本前提,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本部分利用2019—2022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选择将已脱贫家庭中16~60岁(含)的农户作为低收入群体,样本量年均约4100个。从个人特征和就业特征两个维度,对中国脱贫劳动力就业的主要特征和变动趋势进行刻画,并对原因展开分析。结果发现,在个人特征方面,当前脱贫劳动力与农村劳动力整体相比存在适龄劳动力占比较低、健康水平相对较差、受教育程度较低等特点,但是其接受农业培训占比明显更大、培训时长明显更多。在就业特征方面,近年来脱贫劳动力的就业半径有缩小趋势,从事第一、第二产业相关工作的比例有所上升,就业方向以稳定就业为主,但形式更具多样性。

3.1 个人特征

3.1.1 就业潜力较大,健康状况有待提升

通常劳动力的人口结构特征和健康状况均是影响就业结果的重要因素。本文将2019—2022年脱贫人口中劳动力占比与农村整体进行对比分析(图1)。结果表明,脱贫人口中劳动力占比低于农村整体,但是二者差距在逐渐缩小。脱贫劳动力4年间的平均年龄为39.18岁,略低于农村劳动力(40.62岁),且脱贫劳动力中男性劳动力占比为53.91%,高于农村劳动力中男性劳动力占比(52.25%)。以上特征表明脱贫劳动力在劳动市场中具有较大潜力。但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对健康状况的自我认定结果表明,脱贫劳动力自我认定健康状况为一般及以上的占比在各年度中均略低于农村劳动力(图2)。这反映出脱贫劳动力的健康状况整体处于劣势,较低的健康状况可能影响其在劳动市场中的表现,进而影响就业质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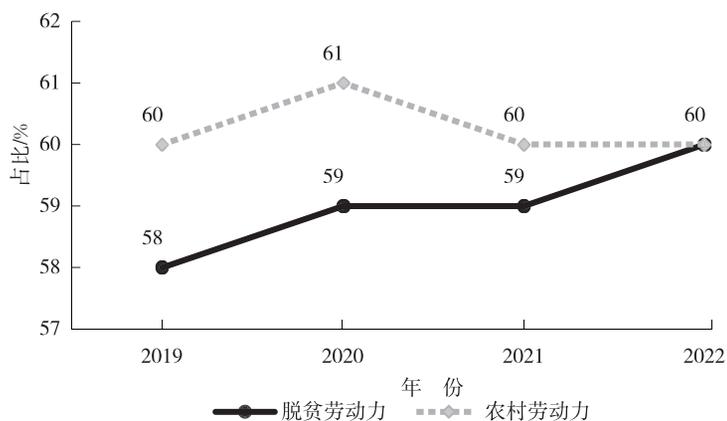


图1 脱贫人口与农村整体适龄劳动人口占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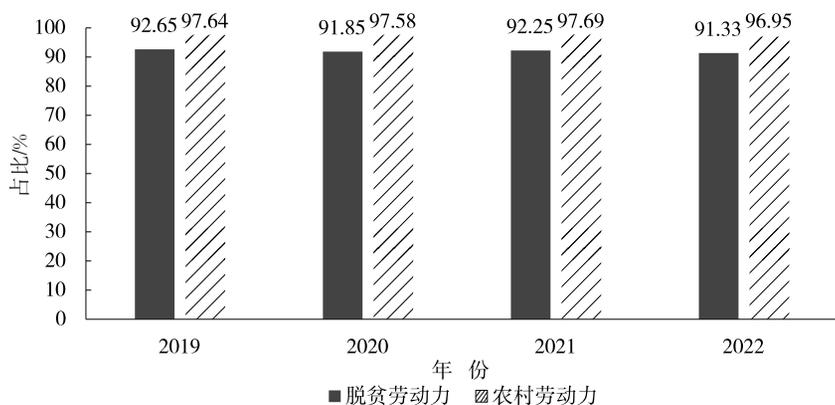


图2 自我认定健康状况为一般及以上占比

3.1.2 脱贫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整体较低，接受农业培训机会更多

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往往是决定个人就业竞争力及其工作内容的重要方面。本文对 2019—2022 年脱贫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在校年限）进行刻画，并将其与农村劳动力进行比较（图 3）。结果表明：一方面，脱贫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在各年度均低于农村劳动力，这可能受到自身家庭和环境等因素的限制；另一方面，脱贫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均存在逐年上升的趋势，且前者的受教育程度增长更快，二者差距从 2019 年的 1.12 年缩减至 2022 年的 0.94 年。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变化可能受到政府部门长期以来对农村地区教育的投入，以及相关教育帮扶政策的实施等因素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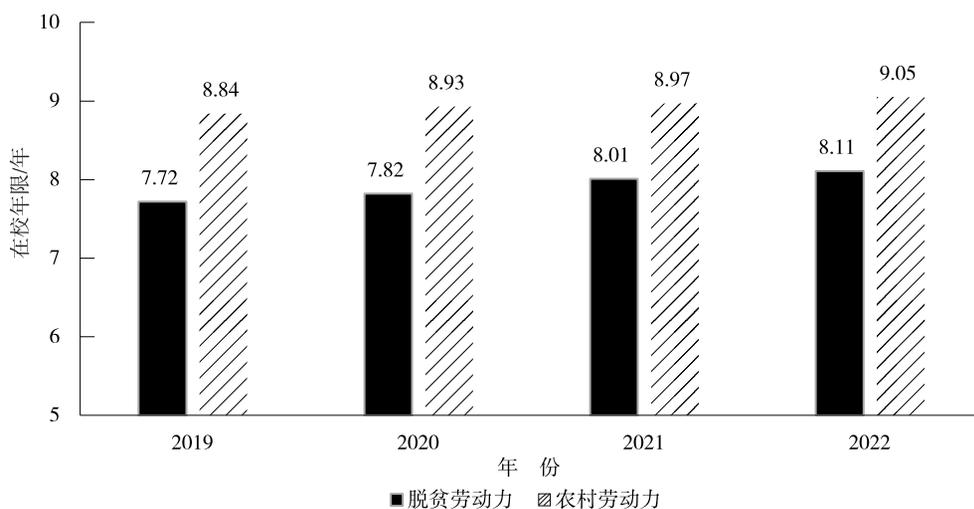


图 3 受教育程度（在校年限）

在接受技能培训的比例和时长方面，脱贫劳动力与农村劳动力之间也存在差异（表 2）。第一，在多数年份，脱贫劳动力接受非农业培训的比例略低于农村劳动力，但是二者间差异较小；第二，脱贫劳动力接受农业培训的比例明显高于农村劳动力，前者为后者的 3 倍以上。此外，在各年份参加培训时间的统计方面，脱贫劳动力参与培训时长在多数年份中超过农村劳动力的 2 倍。上述脱贫劳动力所受培训机会较多的现状，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中国脱贫攻坚过程中各政府部门的政策帮扶。

表 3 接受培训的比例

单位：%

年份	非农培训所占比例		农业培训所占比例	
	脱贫劳动力	农村劳动力	脱贫劳动力	农村劳动力
2019	4	6	18	5
2020	5	6	17	5
2021	5	6	17	5
2022	6	5	18	5

3.2 就业特征

3.2.1 脱贫劳动力就业半径存在缩短趋势

通常根据劳动力就业区域的不同，可将劳动力的就业类型划分为本地就业和外出就业。其中，前者主要指劳动力的就业地在户籍所在乡镇范围内，后者则指劳动力的就业地在户籍所在乡镇之外。根据就业地所处范围不同，还可以进一步将外出就业分为乡外县内、县外省内、跨省、境外就业。本文参照以上的分类方式，对 2019—2022 年脱贫劳动力的外出就业分布情况进行刻画（表 4）。结果显示，在此期间选择乡外县内

就业的脱贫劳动力比例逐年增长,从2019年的21.63%上升至2022年的26.02%;与此同时,县外省内和跨省就业存在一定下降的趋势,分别从2019年的36.26%和42.11%下降至2022年的35.06%和38.80%;境外就业的脱贫劳动力数量较少。以上变动表明,脱贫劳动力就业半径整体存在缩短的趋势,即外出就业的脱贫劳动力正在逐渐回流,该结果与已有文献中所展示在农村劳动力流动特征较为相似^[20]。

表4 脱贫劳动力就业分布

单位:%

年份	就业分布			
	乡外县内	县外省内	跨省	境外
2019	21.63	36.26	42.11	0.00
2020	22.14	36.10	41.77	0.00
2021	24.53	35.56	39.80	0.11
2022	26.02	35.06	38.80	0.12

3.2.2 脱贫劳动力在第一、第二产业中占比上升

从脱贫劳动力就业所选择的行业角度,当前脱贫劳动力在第一产业^①和第二产业^②相关行业的就业比重整体存在上升趋势,在第三产业^③占比略有降低,但是仍然超过半数。本文刻画了2019—2022年脱贫劳动力外出就业分布情况(表5)。结果表明,从事第一产业的脱贫劳动力占比由2019年的1.91%上升至2022年的5.95%;从事第二产业相关工作的脱贫劳动力由2019年的40.96%上升至2022年的43.00%,其中,制造业和建筑业是其主要参与的行业;与此同时,在第三产业就业的脱贫劳动力比例则由2019年的57.14%下降至2022年的51.05%,尽管占比有所下降,但依然是脱贫劳动力最主要的就业方向。在第三产业包含的行业中,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等产业中脱贫劳动力的比例均存在下降趋势,这一定程度上也与新冠疫情对服务和零售相关行业的冲击相关,与此同时,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中的脱贫劳动力人数有所上升,为第三产业劳动力市场注入新的活力。

表5 脱贫劳动力就业分布

单位:%

行业	不同年份就业比例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第一产业	1.91	4.83	3.80	5.95
第二产业	40.96	41.83	41.60	43.00
制造业	16.92	18.88	7.49	14.50
建筑业	20.10	19.98	15.32	19.45
第三产业	57.14	53.37	54.59	51.05
批发和零售业	6.62	3.84	2.46	2.73
住宿和餐饮业	7.00	6.37	6.04	5.95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5.73	10.54	9.06	10.90

① 第一产业涵盖的行业包括农林牧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

② 第二产业涵盖的行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以及建筑业。

③ 第三产业涵盖的行业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业,装卸搬运和仓储业,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保险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以及其他行业。

3.2.3 稳定就业是脱贫劳动力最主要就业类型

就业稳定性是衡量就业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随着当前新生代劳动力占比的不断提高，以灵活就业为特点的就业形式也开始不断壮大。本文对外出就业类型的刻画大致反映出这一特征（表6）。结果发现，脱贫劳动力参与稳定就业的比例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趋势，而打零工群体的占比则呈现出先上升再下降的变动特征。这可能是新冠疫情冲击带来的影响，疫情伊始社会生产活动普遍受到较大干扰，造成稳定就业比例快速下降，零工就业比例上升。而随着疫情监管模式的日益科学和高效，社会生产活动逐渐恢复并步入正轨，使得稳定就业比例在之后年份有一定回升，零工就业比例逐年下降。此外，脱贫劳动力外出就业类型中其他类别的占比与日俱增，从2019年的5.28%上升至2022年的9.23%。这一方面，反映了新生代劳动力对就业灵活性的追求^[21]；另一方面，这也与当前新型职业和就业形式不断涌现的发展趋势较为相符。

表6 脱贫劳动力外出就业类型

单位：%

年份	家庭经营占比	稳定就业占比	打零工占比	其他占比
2019	3.61	56.31	34.79	5.28
2020	5.24	50.39	38.24	6.13
2021	3.56	52.01	37.43	7.00
2022	3.16	50.91	36.70	9.23

4 脱贫劳动力就业问题与挑战

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脱贫人口的就业问题，就业帮扶工作成效显著，但仍然存在就业不充分、专业技能偏低、主动性不强、劳动力市场歧视等问题。

4.1 人力资本水平有待提高

脱贫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明显低于农村劳动力，导致其就业质量不高。一是脱贫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低于农村劳动力。观察点数据显示，2019—2022年，脱贫劳动力在校年限、自我认定健康状况分别比农村劳动力平均低约1年、5%。较低的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可能影响其在劳动市场中的表现，进而影响工资性收入。调研发现，脱贫劳动力中的中老年人往往因健康问题而无法继续打工。二是脱贫劳动力非农技能有待提高。数据显示，脱贫劳动力接受农业技能培训的占比较大，而非农就业是脱贫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方式，亟须提高脱贫劳动力在非农领域的技能水平。

4.2 就业压力和失业风险大

近年来，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等，脱贫劳动力稳岗就业出现了新挑战。一是外出就业稳定性不高。观察点数据显示，稳定就业仍然是脱贫劳动力最主要的就业方向，但脱贫劳动力稳定就业比重逐年下降，且明显低于农村劳动力。2022年脱贫农村劳动力稳定就业占比为50.91%，而农村劳动力为61.80%，比脱贫劳动力高约10个百分点。二是就业岗位匹配度较低。由于一些脱贫劳动力年龄大、学历低，缺少获取信息的渠道和能力，脱贫劳动力技能与市场的实际需求存在明显错位，人岗匹配率低。三是就业质量不高。脱贫劳动力就业主要以制造业和建筑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从事信息传输业、金融业、科学研究等高新技术行业的占比较低，且容易受到产业结构调整造成的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问题。

4.3 就业保障机制不健全

脱贫劳动力面临着社会保障不足、收入不稳定等问题，兜底保障机制有待提升。一是社会保障水平低，福利差距大。目前在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方面存在明显城乡差异。在养老金方面，2023年农村居民平均每月领取的基础养老金为223元^①；在工伤保险方面，调研发现，一些企业或平台通过购买商业保险的方式一定程度上保障了零工的劳动权益，但与工伤保险相比，商业保险普遍附加值低、保障力度小。二是社会保险有效衔接问题。当前尚未出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办法，导致实践操作中两个险种不能实现转移合并，影响脱贫劳动力自由流动。三是政策瞄准性有待提升。在就业帮扶安排方面，存在部分公益性岗位的泛福利化倾向，甚至存在部分岗位被非脱贫劳动力获得的情况；还存在部分劳动力工资拖欠、就业歧视等问题。

5 常态化就业帮扶政策建议

脱贫劳动力常态化就业帮扶应坚持实施防止返贫就业攻坚行动，以“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为目标，坚持政府主导与市场参与协调共进、外出就业与就近就业双轮驱动、内生动力与兜底保障双向发力，构建常态化就业帮扶体系，促进脱贫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

5.1 建立常态化动态监测体系

加强对脱贫劳动力就业情况的动态监测，实现就业信息的精准掌握。一是建立常规监测机制。建立健全脱贫劳动力和低收入群体等就业困难人员档案，以及岗位供给清单和外出务工需求清单，实现脱贫劳动力就业信息动态管理和监测。二是建立应急反馈机制。在自然灾害较多的欠发达地区，建立风险防范预案，开展应急监测，一旦发生特殊情况，及时将就业信息提供给有关部门，坚决守住不发生因失业导致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三是建立信息平台共享机制。有效整合各省份、各部门的数据资源，建立防返贫信息共享平台，做好输入地、输出地信息和服务对接，促进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和低收入群体动态监测的有效衔接。

5.2 丰富拓展就业渠道

坚持外出就业和就近就业双轮驱动，提升脱贫劳动力就业服务质量。一是继续支持脱贫劳动力外出务工。充分发挥东西部劳务协作、对口支援、定点帮扶和省内劳务协作机制作用，推动脱贫劳动力转移就业；提升外出就业服务质量，探索将脱贫劳动力纳入常住地就业困难人员认定范围，享受均等化的就业服务。二是拓宽就地就近就业渠道。鼓励欠发达地区发展特色产业和乡村旅游，激发县域经济活力，通过产业发展增加就业岗位；通过支持发展就业帮扶车间、以工代赈项目、公益性岗位等方式扩大就业规模；鼓励并支持脱贫劳动力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

5.3 激发内生发展动力

全面提高脱贫劳动力的素质，增强脱贫劳动力就业创业能力，这也是激发其内生动力的重要手段。一是加强技能培训。根据脱贫劳动力的特点和需求，开展针对性的技能提升行动，更加强调技能的实用性和针对性。鼓励脱贫劳动力参加职业技能鉴定，提高其在劳动力市场的认可度。二是提升健康水平。关注脱贫劳动力的身体健康状况，加强对有基础疾病或残疾的脱贫劳动力监测和保护，防止其因病返贫。三是提高文化程度。继续开展“雨露计划”就业促进专项行动，引导脱贫家庭的年轻劳动力接受职业院校教育，提高其在就

^① 数据来源：根据《2023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测算得出。

业市场的竞争力。

5.4 完善社会保障帮扶机制

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服务体系,实现政府兜底帮扶和社会帮扶的有效衔接。一是完善保险制度。加大社会保险缴费、失业保险等政策的落实力度,逐步提高农村养老金领取标准,加强脱贫劳动力社保的有序衔接。二是提高补贴标准。提高脱贫劳动力外出就业补贴、创业补贴标准,不断提高脱贫劳动力就业创业的积极性。三是维护合法权益。着力解决劳动力同工不同酬、欠薪问题,确保工资足额按时发放。同时,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培训,使更多脱贫劳动力学会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 [1] 平卫英, 罗良清, 张波. 我国就业扶贫的现实基础、理论逻辑与实践经验 [J]. 管理世界, 2021, 37 (7): 32-43.
- [2] 黄锐, 段瑞鹤, 杨艳. 就业扶贫工程的政策注意力研究 [J]. 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19 (4): 88-97.
- [3] 蔡小慎, 王雪岚, 王淑君. 可持续生计视角下我国就业扶贫模式及接续推进乡村振兴对策 [J]. 学习与实践, 2021 (5): 30-41.
- [4] 陈红平. 易地搬迁脱贫人口稳岗就业服务链构建探究 [J]. 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23 (2): 78-86.
- [5] 王菊, 李小勇. 脱贫劳动力“户一岗”适配与就业稳定研究: 以广东 H 区对口协作贵州 G 县为例 [J].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41 (3): 84-97.
- [6] 张成刚, 辛茜莉. 让政府、平台、劳动者三方共赢: 以公共就业服务融合新就业形态为视角 [J]. 行政管理改革, 2022 (2): 79-87.
- [7] 张涛, 张琦. 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就业减贫机制构建与路径优化 [J]. 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57 (4): 129-136.
- [8] 韩佳丽. 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减贫的现实困境及政策选择: 基于连片特困地区微观农户调查 [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0 (1): 99-110.
- [9] 汪三贵, 郭建兵, 胡骏.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若干思考 [J]. 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 58 (3): 16-25.
- [10] 张琦.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增强脱贫地区内生发展动力 [J]. 农业经济与管理, 2022 (6): 8-11.
- [11] 李实, 史新杰, 陶彦君, 等. 以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为抓手促进共同富裕: 重点、难点与政策建议 [J]. 农业经济问题, 2023 (2): 4-19.
- [12] 汪三贵, 周诗凯. 构建过渡期后农村低收入人口帮扶机制: 脱贫攻坚的经验与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帮扶的启示 [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3): 5-19, 205.
- [13] 北京联办财经研究院. 赞皇县脱贫人口收入增长分析 [J]. 经济导刊, 2023 (3): 52-59.
- [14] PANDA B. National rural employment guarantee scheme : development practice at the crossroads [J]. Economic & Political Weekly, 2015 (23): 126-131.
- [15] FERNANDES D. Implementation of MGNREGA & its impact on rural Madhya Pradesh [J]. Indian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2015, 50 (3): 505-516.
- [16] 王安邦, 何可, 张俊飏. 放开生育政策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吗? [J]. 中国农村经济, 2022 (9): 82-99.
- [17] 郭政彤, 张含宇. 旅游业发展对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回流意愿的影响 [J]. 南方经济, 2022 (10): 73-92.
- [18] 刘晓光, 张勋, 方文全. 基础设施的城乡收入分配效应: 基于劳动力转移的视角 [J]. 世界经济, 2015, 38 (3): 145-170.
- [19] 姚志, 刘健, 种聪. 新生代农民工高质量就业: 政策演化、理论逻辑与国际经验 [J]. 世界农业, 2023 (7): 14-27.
- [20] 高鸣. 促进农村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 目标、困境与政策构想 [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3): 1-10.
- [21] 谢玲红. “十四五”时期农村劳动力就业: 形势展望、结构预测和对策思路 [J]. 农业经济问题, 2021 (3): 28-39.
- [22] 张欣缘, 许秀文, 袁卉馥. 乡村振兴视域下河北省脱贫人口就业帮扶政策实施问题研究 [J]. 河北北方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39 (1): 48-52, 69.
- [23] 段成荣, 谢东虹, 吕利丹. 中国人口的迁移转变 [J]. 人口研究, 2019, 43 (2): 12-20.

Employment Status and Problem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Labor Force and Construction of Normalized Assistance Mechanism

CHONG Cong LI Zhenlin

Abstract: After the comprehensive victor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how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labor force achieve full employment, help the economy of underdeveloped areas to continue to grow, is an important issue facing the “three rural” fields in China at present. This paper uses micro-survey data to conduct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employment statu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labor force from 2019 to 2022, sort out the key issues in the current employmen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labor force, and finally build a regular assistance system from the aspects of establishing a dynamic monitoring mechanism, optimizing the employment service mechanism, establishing an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promotion mechanism, and optimizing the employment guarantee mechanism. Help poverty alleviation labor force achieve high-quality full employment.

Keywords: Poverty Alleviation Labor Force; Less Developed Areas; Employment Characteristics; Normalized Assistance

(责任编辑 卫晋津 李 辉)

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群体代际传递的影响研究

◆ 吴贤荣¹ 罗小锋²

(1. 武汉工程大学法商学院 武汉 430205;

2.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0)

摘要: 中国在脱贫攻坚战中取得了全面胜利, 消除了绝对贫困, 但低收入群体规模依然庞大, 其代际传递问题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制约因素。本文基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群体代际传递的阻断效应。结果表明: 第一,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父代收入提升能显著提高子代收入水平, 降低子代对父代的经济依赖, 增强经济自主性, 从而阻断低收入代际传递, 其中覆盖广度的阻断效果最为显著; 第二,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加速子代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积累进程, 提升其收入能力, 进而切断代际贫困链条; 第三, 该效应对农村地区、30 岁以下低收入子代家庭及男性子代群体的影响尤为显著。据此, 本文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以强化数字普惠金融在阻断低收入代际传递中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 数字普惠金融; 低收入群体; 代际传递

DOI: 10.13856/j.cn11-1097/s.2025.09.003

1 引言

到 2020 年底, 中国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党的二十大报告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进一步明确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与实现路径。尽管中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 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存在, 部分区域经济水平相对落后, 不少居民和家庭收入水平较低, 发展能力相对不足, 发展机遇相对缺乏。尤为值得关注的是, 这种低收入现象呈现出代际传递特征^[1-2], 主要表现为低收入状态在家庭内部延续, 子代成年后往往步父代后尘, 难以摆脱低收入困境。在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后, 研究如何精准帮扶低收入群体, 防止贫困代际传递, 阻断返贫路径, 减少低收入在代际间的传递, 是确保帮扶机制长效稳定运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必须关注和解决的关键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金融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依托数字经济迅速崛起, 成为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抓手。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金融助力脱贫战略, 但传统金融发展模式存在金融排斥现象, 难以为低收

收稿日期: 2025-06-1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农业碳减排地区间横向补偿机制研究”(24CGL075)。

作者简介: 吴贤荣(1987—), 女, 湖北恩施人, 博士, 校聘教授, 研究方向为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农村金融。

通信作者: 罗小锋(1976—), 男, 湖北武汉人, 博士, 教授, 研究方向为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E-mail: luoxiaofeng@mail.hzau.edu.cn。

入群体、小微企业及欠发达地区居民等提供充分有效的金融服务。为破解这一难题，中国全面推进普惠金融政策，并在数字化浪潮中加速向数字普惠金融转型。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数字普惠金融”概念，2021年发布的《“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将数字普惠金融服务行动列为优先行动，2022年国务院发布《“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一系列政策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作用。值得深入探讨的是：在构建低收入群体帮扶长效机制的过程中，数字普惠金融能否阻断低收入代际传递，其作用机制如何？针对上述核心问题，本文深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代际传递的影响，为完善数字普惠金融体系及低收入群体帮扶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降低信贷资金获取约束和限制，更为体现普惠特性。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通信互联网设备的普及，降低了欠发达地区家庭的信息获取难度，提高了信息传播率。诸多学者从农户个体、家庭以及企业等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数字普惠金融降低信贷限制约束的影响，普遍认为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信贷可得性、降低金融脆弱性和促进企业发展，推动了经济社会包容性增长^[3-4]，同时，数字普惠金融的推广有益于就业水平的提升，从而实现家庭增收目标^[4]。以往学者对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就业方面有诸多研究，普遍认为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就业水平提高^[5]。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提升居民就业率并增加就业收入，疫情时期的数据也显示其显著促进了非农就业^[6]；另一方面，诸多研究证实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激发个体创业活力、扩大企业用工需求，有效创造就业岗位并提升整体就业水平。该效应在城镇化水平较低的省份及小微企业群体中尤为显著，充分凸显了数字金融的普惠特质^[7]。数字普惠金融不但有助于为个体提供平等、便捷的创业机会，改善个体的创业行为并提高创业活跃度^[8]，同时还有效解决了企业，尤其是中小微型企业的融资需求，有利于企业生产效能和盈利的提高，进而增加企业的预期回报率和对劳动力的需求，有利于就业质量的提升^[9]。

综上所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提高个体或家庭的收入水平，有利于推动共同富裕^[10-12]，为本文的开展奠定了一定理论基础，但就数字普惠金融与低收入群体的代际传递之间关系研究仍有待拓展。相比现有文献，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一是采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与蚂蚁金服集团测算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分别探究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代际传递的作用机理，为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二是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增加教育和健康投资影响子代人力资本，通过提升组织参与和社会网络影响社会资本，进而影响低收入群体代际传递，进一步丰富和拓展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为更好推动经济协调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证据支撑；三是借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城乡异质性、年龄异质性、性别异质性等不同维度对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低收入群体的代际传递进行了研究，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情境方面具有一定实践意义，也为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2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说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通过提升父代收入，经代际收入传递机制影响子女收入水平。它不仅能增加家庭融资本、拓宽信息渠道，还能增强社会信任，推动农村家庭选择多元高效的生计策略，特别是非农主导型生计策略^[13]，推动劳动力向非农业领域的迁移，进一步增加他们的工资收入^[14]。父代收入增加通常意味着更多教育资源可投入子代教育，提高教育水平和增加就业机会。同时，父代收入影响子代健康状况，较高收入家庭能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和医疗保障，提升子代身体健康水平。此外，父代社会网络随收入提升而扩大，有助于子代就业和收入提升。

本文聚焦数字普惠金融如何改善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进而提高子代收入，阻断低收入群体代际传递。从人力资本视角看，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低成本高效率的服务，在就业、医疗、教育等方面提供资金，改善生活条件，提高就业和收入水平，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扩大教育金融服务覆盖

面、降低教育投资门槛、优化资源配置以及提升金融素养等渠道,有效地提升了人力资本水平^[15]。同时,通过金融产品促进子代教育和健康水平提升。有研究认为在金融市场及网络借贷市场中存在投资者学习行为,居民在参与数字金融服务过程中通过不断积累和实践会逐渐提高自身的金融素养,进而又促进个体参与数字金融^[16-17]。可见,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和个体金融素养的提升之间的促进是相互的。从社会资本视角看,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加强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巩固关系网络,扩大经济优势,方便合作交流,增进信息共享。对于低收入家庭,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建立社交网络,获取信息和资金援助,推动个人成长和收入增长。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学者一致认为,通过增加社会资本的积累,数字化普惠金融可以促进个人和家庭收入的增长^[18],数字经济发展的硬件基础可以减少农村户口子代对父代社会资本的继承^[19],数字经济及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促使了社会网络关系重构,拓展居民获取社会资源的广度和深度。综上,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群体代际传递的作用机理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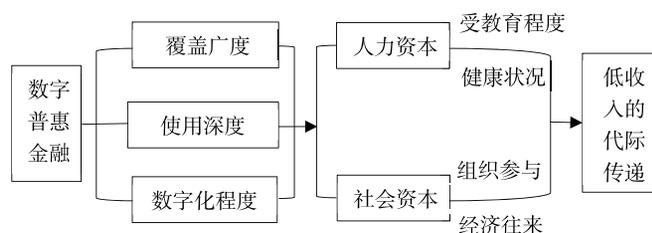


图1 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群体代际传递的作用机理

2.1 人力资本传导机制

人力资本理论最早起源于经济学研究。人力资本顾名思义是体现在个体身上的资本,就是人们身上所具备的各种有价值的能力和素质。这些能力和素质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些并非天生具备,需要后天教育和培训获得,比如生产知识、劳动及管理能力和健康素质等方面。对个体人力资本的投资不仅包括直接的教育和培训支出,还包括人们在接受教育时所放弃的其他机会成本。然而,低收入群体代际传递的一个核心问题在于人力资本的匮乏。由于种种原因,低收入家庭往往无法为孩子们提供足够的教育和培训机会,导致他们的知识水平较低、认知能力受限、身体素质较差,同时缺乏必要的技能和劳动力。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孩子们的个人发展,还进一步深化了家庭的低收入状况,形成低收入的恶性循环。总之,人力资本的匮乏是体现在知识水平低、认知局限、身体素质差、没有技能和劳动力等方面,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深远,也是最常见的导致低收入代际传递的原因之一。

教育是公认的对阻断低收入代际流动性的重要影响因素。已有研究证实受教育程度与个体的收入水平显著相关,而数字金融可能从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两个渠道影响收入水平^[2,20]。受教育程度越低,低收入代际流动越有可能发生^[17]。在多数低收入家庭中,父辈受历史原因或经济条件的限制,往往未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因此,他们对教育的价值认识可能存在偏差,不愿意或无法为子女投入足够的教育资源。这种观念上的误区以及对教育回报率的片面理解,导致低收入代际传递家庭中的子女普遍未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当父辈让子女过早地承担家庭的经济责任,子代可能会错过接受良好教育、培养专业技能和积累工作经验的机会,导致子女在职业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限制他们未来的职业选择和发展空间。无法从事高技能或高收入的职业,导致他们难以突破父代的壁垒,重复父辈的低收入遭遇。

健康是衡量人力资本的又一重要指标。当家庭中发生疾病遗传、健康状况不佳时,就会没有劳动力或劳动力不足,整个家庭就会陷入经济困难,更容易发生低收入代际传递现象。此外,对子代来说,健康的体魄可以使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学习和自我提升,从而影响收入。幼儿健康发展对于阻断低收入代际传递有很重要的意义,子代越健康,越有精力和时间提升收入水平,所以保障儿童健康是切断低收入代际传递的重要手段。

2.2 社会资本传导机制

20 世纪 60 年代,“布劳-邓肯模型”探讨了社会流动中个体社会地位获得的因果模型。根据这一模型的推演,先天赋予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个体在社会中的起点,如父亲的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等;在社会地位和经济成就方面,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更易受到上一辈的影响,低收入在代际间传递的可能性也较大。中国是一个关系型社会,人际关系、社会地位对于个人的生活和事业发展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人们通常会通过建立和维护人际关系来获得社会资源和成功机会。

社会资本理论认为,想要更好地发展人力资本,拥有社会资本是非常必要的,缺乏社会资本,更容易产生低收入阶层固化。在以往研究中,学者对社会资本进行多个维度的划分,以便测量各个维度的社会资本对低收入的影响机理和不同维度对脱贫的作用效果^[5],实证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可以直接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个体社会资本对个人和家庭具有直接且显著的利益;个体社会资本总量与低收入代际传递显著负向相关^[1,10,21],即低收入个体拥有高质量的社会资本是帮助他们摆脱低收入的重要途径,也是阻断低收入代际传递的有效手段。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待验证的研究假设。

H_1 :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缓解低收入代际传递。

H_2 :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影响子代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进而提升子代的收入即经济水平,从而有效缓解低收入代际传递。

3 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3.1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数据源为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CFPS 数据具备以下优势:其一,涵盖全国 25 个省份(占全国人口 94.5%)约 16 000 人的经济与非经济数据,虽未覆盖西北部分省份及港澳台地区,但样本具有全国代表性,且从社区、家庭、个人 3 个层面进行了全面调查,确保了数据的可信度与代表性;其二,在研究低收入代际传递的过程中,收入是核心要素,与经济基础和生活水平密切相关。该数据库针对收入的问题划分明确,含有匹配的家庭与个体编码,便于跨代收入研究与测度。采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公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研究有以下几点优势:一是基于蚂蚁金服交易账户大数据分析,准确反映全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及趋势;二是该指数多维度、多层次,支持地域与时间维度的对比分析,有效展示服务程度变化;三是该指数在学术界得到广泛应用,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便于研究结果的分析与比较。

截至 2024 年底,CFPS 已经发布了 8 轮调查数据(从 2010 年开始每隔一年统计一次)。考虑到数据可得性和匹配性问题,本文选择 CFPS 数据中 2012 年、2014 年、2016 年、2018 年、2020 年 5 次的数据。

3.2 变量选取

在分析低收入代际传递的过程中,鉴于需要同一个家庭中两代人的数据,本文根据个体与其父亲的编码对父亲与子女样本进行了匹配。在获取同一个家庭的子代与父代样本后,执行了以下数据准备工作。第一,剔除了父代代码无法识别的样本;第二,排除了问卷中未回答、拒绝回答或回答不清的样本;第三,移除了子代年龄小于 16 岁及父代年龄超过 65 岁的样本,以聚焦具有经济活动能力的家庭成员,从而更精确地评估数字普惠金融对减缓低收入代际传递的作用,并减少生命周期偏误;第四,鉴于数据跨越多个年度,本文使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将各年份的收入数据调整至 2020 年水平,以确保可比性;第五,本文聚焦低收入的代际传递,仅保留了父代与子代均处于相对低收入状态的家庭样本,即家庭收入低于每年样本家庭收入中位

数的 50%。

被解释变量：子代收入。考虑到收入多样性，不能仅用某一方面的收入来作为居民全部收入来源，本文用数据库中个体的年内总收入来衡量^[22]。

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公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进行衡量。该指数全面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情况，在传统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之上，结合数字普惠金融的全新特征，从 3 个维度（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来构建。父代收入，用数据库中个体父代的总收入来衡量^[23]。

本文沿用 Solon 的研究结论，选取子代和父代的年龄作为重要的控制变量^[22]，另参考孙三百等^[23]的做法，引入子代与父代的性别、婚姻状况、教育年限以及户口情况等个体特征作为控制变量。性别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学因素，可能对个体的职业选择和收入水平产生影响。婚姻状况可能影响个体的家庭责任和经济决策。教育年限则直接反映了个体的受教育程度，是决定个体收入水平的关键因素之一。户口情况则涉及城乡差异和地域差异，可能对个体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产生影响。这些变量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个体收入水平，因此将它们纳入模型中是必要的。具体而言，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子代性别（女性为 0，男性为 1）、父代和子代受教育程度（1=未接受教育、2=小学、3=初中、4=高中/中专/职高/技校、5=大专、6=本科、7=硕士、8=博士）、子代和父代年龄、家庭规模、子代和父代健康状况（1=不健康、2=一般、3=比较健康、4=很健康、5=非常健康），子代和父代户口（1=城镇、2=乡镇），经过数据预处理共得到 2 829 对代际样本数据。对所选取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列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代码	变量名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fincome</i>	父代收入	2 829	3.786	4.515	0	9.793
<i>fage</i>	父代年龄	2 829	53.428	6.024	26	64
<i>fhukou</i>	父代户口	2 829	0.133	0.339	0	1
<i>fhealth</i>	父代健康	2 829	3.062	1.235	1	5
<i>fedu</i>	父代教育	2 829	1.643	0.761	1	4
<i>fgender</i>	子代性别	2 829	0.696	0.46	0	1
<i>zincome</i>	子代收入	2 829	7.141	4.51	0	13.006
<i>zage</i>	子代年龄	2 829	27.147	5.361	17	50
<i>zhukou</i>	子代户口	2 829	0.168	0.374	0	1
<i>zhealth</i>	子代健康	2 829	3.68	1.012	1	5
<i>zedu</i>	子代教育	2 829	2.42	1.076	1	4
<i>familysize</i>	家庭规模	2 829	4.904	2.134	1	14
<i>index aggregate</i>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2 829	210.759	59.824	154.62	431.93
<i>coverage breadth</i>	覆盖广度	2 829	197.785	58.659	139.9	397
<i>usage depth</i>	使用深度	2 829	186.513	70.457	107.29	488.68
<i>digitization level</i>	数字化程度	2 829	297.664	53.977	230.71	450.08

注：表中父代收入和子代收入运用 CPI 指数将各年份收入数据调整至 2020 年水平，单位为万元。

3.3 模型设定

本文基于 Zhu 等^[20]、Solon^[22]对代际收入传递的研究，在代际收入理论的基础上构建模型（1）：

$$\ln y_{1i} = \beta \ln y_{0i} + \epsilon \tag{1}$$

式 (1) 中, y_{0i} 表示第 i 个相对低收入家庭中父代的收入; y_{1i} 表示第 i 个相对低收入家庭中子代 (儿子或女儿) 的收入; ϵ 为随机干扰项; β 表示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的影响程度, 即代际收入弹性。代际收入弹性在 0~1。 $\beta=1$, 表示子女完全继承父母收入地位, 低收入易发生代际传递, 产生阶级固化; $\beta=0$, 则表示子女收入完全不受父辈的影响, 与父母无关^[24]。

本文参考已有学者的研究采用交互项方法^[25], 构建模型 (2)。交互项为: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父代收入对数, 它反映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如何调节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的影响。

$$\ln zincome_{it} = \beta_0 + \beta_1 \ln fincome_{it} + \beta_2 index_{it} + \beta_3 \ln fincome_{it} \times index_{it} + \beta_4 age_i + \beta_5 fage_i + \gamma controls + \mu \tag{2}$$

式 (2) 中, $fincome_{it}$ 、 $zincome_{it}$ 分别表示第 i 个相对低收入家庭中父代、子代在 t 年的收入。 $index_{it}$ 表示 i 省份在 t 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 age_i 和 $fage_i$ 分别表示子代年龄和父代年龄。 β_1 表示相对低收入家庭中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的影响程度, 即代际收入弹性; β_2 表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子代收入的影响; β_3 代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代际收入流动的调节作用; 如果交互项系数为负, 说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助于减弱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的影响, 减缓在经济地位上继承父母的低收入, 即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缓解低收入的代际传递。 β_0 表示模型的常数项, β_4 和 β_5 分别表示子代年龄和父代年龄的系数, $controls$ 为控制变量集合, γ 为控制变量的系统, μ 为随机干扰项。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基准回归结果

按照上文实证模型并经过对数据的筛选和处理后保留了全国 25 个省份的 2 829 组代际关系, 对这组数据进行线性回归分析, 结果如表 2 所示。列 (1) 只考虑数字普惠金融对子代收入的影响, 列 (2) 和列 (3) 逐步加入子代特征和父代特征控制变量, 列 (4) 加入家庭规模这一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进行回归。

表 2 模型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子代收入	子代收入	子代收入	子代收入
父代收入	0.160 4*** (0.020)	0.143 5*** (0.020)	0.144 3*** (0.020)	0.141 1*** (0.020)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0.288 4*** (0.028)	0.254 7*** (0.028)	0.252 7*** (0.028)	0.247 1*** (0.028)
数字普惠金融×父代收入	-0.132 2*** (0.034)	-0.109 4*** (0.033)	-0.112 8*** (0.034)	-0.112 2*** (0.033)
子代教育		0.665 9*** (0.075)	0.671 0*** (0.077)	0.623 9*** (0.079)
子代年龄		-0.027 3* (0.015)	-0.054 6** (0.021)	-0.048 9** (0.021)
子代性别		0.148 0 (0.165)	0.166 6 (0.167)	0.176 0 (0.166)
子代户口		0.5847*** (0.205)	0.727 7*** (0.262)	0.707 7*** (0.262)
父代年龄			0.027 9 (0.019)	0.029 3 (0.019)
父代教育			0.070 6 (0.106)	0.081 3 (0.106)

(续)

变量	(1)	(2)	(3)	(4)
	子代收入	子代收入	子代收入	子代收入
父代户口			-0.387 4 (0.283)	-0.397 5 (0.282)
家庭规模				-0.121 2*** (0.039)
常量	6.733 2*** (0.129)	5.691 4*** (0.476)	4.727 0*** (0.784)	5.208 0*** (0.796)
观测值	2 829	2 829	2 829	2 829
R ²	0.152	0.184	0.185	0.188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表 3 至表 10 同。

观察表 2 列 (2)，子代教育、年龄、户口均显著影响其收入，其中户口和教育在 1% 水平显著，年龄则在 10% 水平显著。在相对低收入群体中，子代年龄与收入负相关，可能因受教育程度限制，缺乏新兴行业技能，多从事体力劳动，随着年龄增长，劳动力下降，就业选择受限，导致收入降低，这与杨帆和曹艳春关于低收入群体增收机制的研究结果一致^[26]。加入父代控制变量和家庭规模变量后 [列 (3) 和列 (4)]，交互项保持 1% 显著性水平，系数波动不大。家庭规模与子代收入呈显著负相关，表明相对低收入家庭中，家庭规模越大，父代收入及数字普惠金融对子代收入影响越小，可能因小规模家庭的父母能给予子代更多关注与投资。

综合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降低了相对低收入代际收入弹性，有效阻断了低收入代际传递。引入子代及家庭规模等控制变量后，结果依旧稳健，验证了 H_1 。子代控制变量较父代更显著，表明父代收入虽有潜在影响，但子代特质和努力在决定收入上更重要。城镇户口和受教育年限显著提高了子代收入。家庭规模大会限制家庭资源分配，影响子代人力资本积累和未来收入。

基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与蚂蚁金服集团测算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所构建的 3 个维度（广度、深度、数字化程度）细分指标，分别再次进行回归估计，进一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二级指标分别可能对低收入代际传递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数字普惠金融分维度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子代收入	子代收入	子代收入
父代收入	0.141 9*** (0.020)	0.165 0*** (0.020)	0.169 8*** (0.020)
覆盖广度	0.025 1*** (0.034)		
覆盖广度×父代收入	-0.115 4*** (0.034)		
使用深度		0.015 7*** (0.002)	
使用深度×父代收入		-0.041 8 (0.028)	
数字化程度			0.020 4*** (0.003)
数字化程度×父代收入			-0.055 1 (0.037)
子代教育	0.626 0*** (0.079)	0.638 5*** (0.080)	0.675 8*** (0.079)

(续)

变量	(1)	(2)	(3)
	子代收入	子代收入	子代收入
子代年龄	-0.0459** (0.021)	-0.0469** (0.021)	-0.0560*** (0.021)
子代性别	0.1769 (0.166)	0.1897 (0.167)	0.1163 (0.167)
子代户口	0.7125*** (0.263)	0.6771** (0.263)	0.6175** (0.260)
父代年龄	0.0278 (0.019)	0.0292 (0.019)	0.0419** (0.019)
父代教育	0.0839 (0.106)	0.0914 (0.106)	0.0543 (0.106)
父代户口	-0.4169 (0.283)	-0.4282 (0.283)	-0.2652 (0.281)
家庭规模	-0.1244*** (0.039)	-0.1218*** (0.039)	-0.1258*** (0.038)
常量	6.0170*** (0.883)	5.7081*** (0.886)	5.1597*** (0.875)
观测值			
R ²	2.828	2.828	2.828
常量	0.189	0.183	0.184

表3列(1)为覆盖广度替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估计的结果,列(2)和列(3)为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替换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3个子指标和子代收入呈显著正相关,覆盖广度与父代收入的交互项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表示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的提高有利于降低低收入家庭的代际传递,促进代际流动。具体来说,随着数字普惠金融服务覆盖广度逐渐扩大,越来越多的用户群体使用第三方支付平台并在电子账户绑卡,为该地区创造了一个更加便捷可得的金融环境,使得低收入群体也能更容易地获得金融服务。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主要通过覆盖广度的提高,降低金融服务的门槛,增加低收入群体获得金融服务的可能以及改善获得金融服务的程度,从而降低代际收入弹性,阻断低收入代际的传递。但是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2个子指标与父代收入的交互项并不显著,表明这2个维度对相对低收入家庭的收入代际产生的影响并不显著,即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不能影响低收入家庭的代际传递。

4.2 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

滞后一期的内生性检验。计量模型估计中,内生性问题会使估计结果有偏。对于这一问题,本文在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代际传递的影响时,在模型中引入滞后一期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反向因果带来的内生性问题。CFPS数据反映了被调查对象在过去一年的情况,在数据时效上具有一年的滞后性,这意味着2020年的数据实际上涵盖了有关2019年的信息,所以本文参考张勋等^[27]采用前一年的数字普惠金融数据进行匹配并排除其他控制变量存在的潜在性问题,结果如表4所示。总体结果来看,滞后一期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父代收入的交互项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降低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的影响效果,从而有利于子代收入的提升,阻断低收入家庭的代际传递。该结果与上文实证回归结果均一致,进一步检验了本文核心结论的稳健性。

替换变量稳健性检验。参考李芳芝和张焕明^[28]等学者的做法,将父亲的收入用家庭收入去替代。结果如表5所示,替换关键解释变量后交互项系数仍显著为负与前文保持一致,说明回归结果有较好的稳健性。

表 4 滞后一期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子代收入
父代收入	0.164 7*** (0.021)
滞后一期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0.022 3*** (0.003)
滞后一期的数字普惠的金融指数×父代收入	-0.090 9*** (0.000)
子代教育	0.614 8*** (0.079)
子代年龄	-0.042 5** (0.021)
子代性别	0.143 0 (0.165)
子代户口	0.741 6*** (0.263)
父代年龄	0.028 9 (0.019)
父代教育	0.074 2 (0.106)
父代户口	-0.405 8 (0.282)
家庭规模	-0.124 3*** (0.039)
常量	4.765 2*** (0.792)
观测值	2 829
R ²	0.187

表 5 替换父代收入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子代收入
家庭收入	1.337 4*** (0.087)
数字普惠金融	0.226 3*** (0.028)
数字普惠金融×家庭收入	-0.088 0** (0.035)
子代教育	0.415 6*** (0.077)
子代年龄	-0.029 5 (0.020)
子代性别	0.048 8 (0.161)
子代户口	0.760 1*** (0.256)
父代年龄	0.029 3 (0.018)
父代教育	-0.008 1 (0.105)
父代户口	-0.559 4** (0.275)
家庭规模	-0.311 4*** (0.039)
常量	-7.048 7*** (1.110)
观测值	2 756
R ²	0.247

置换检验。为进一步排除其他随机因素对回归结果的干扰，本文通过置换检验来更好地验证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代际传递的影响是否统计显著，得出的置换检验结果如表 6 所示。

表 6 置换检验结果

T (obs)	Test	<i>c</i>	<i>n</i>	<i>P</i>	SE (<i>P</i>)	[95%CI (<i>P</i>)]
-0.1129	lower	0	500	0.000	0.000	[0.000, 0.007]
	upper	500	500	1.000	0.000	[0.9926, 1.000]
	Two-sided			0.000	0.000	

注：表中 T (obs) 为观测值系数；Test 表示检验类型，lower、upper 和 Two-sided 分别对应单侧下限检验、单侧上限检验和双侧检验；*c* 为置换检验临界值，*n* 抽样次数，*P* 为显著性水平；SE (*P*) 表示 *P* 值的标准误差；[95%CI (*P*)] 表示 *P* 值的 95% 置信区间。

随机抽样 500 次进行回归，得出的回归数据生成到一张表格区间中去，如图 2 所示。在这 500 次随机抽样结果中，所得到的估计系数主要集中在 0 点附近，并且呈正态分布趋势，基准回归估计的系数完全在伪回归区间 $[-0.050, 0.050]$ 之外，也就是说这 500 次的随机抽样所得到的估计系数与之前基础回归所得到的交互项系数是不同的，说明本文基准回归结果并非随机，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阻断低收入在代与代之间的传递作用。

4.3 传导机制分析

前文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其 3 个维度（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对低收入代际传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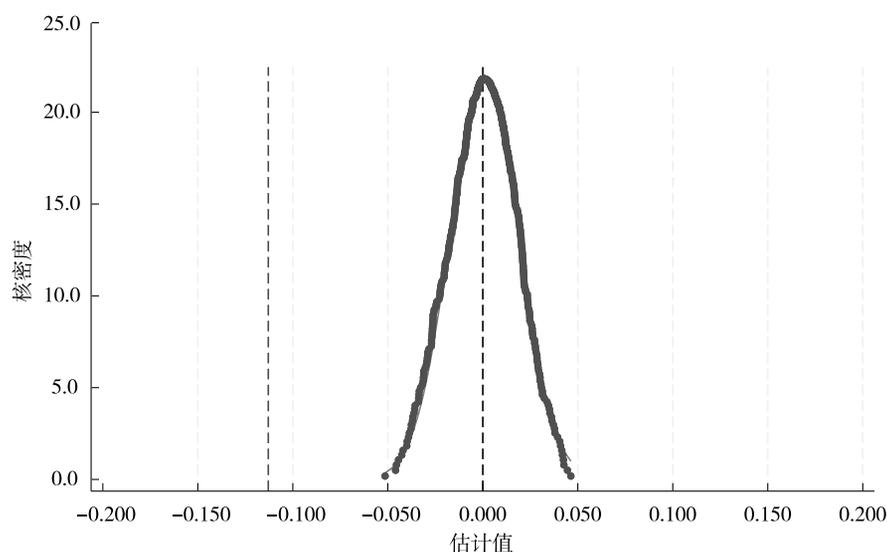


图 2 置换检验效果

的直接影响。接下来，本文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视角验证 H_2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子代的人力资本（以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衡量）和社会资本（以个体与亲友的经济往来及组织参与为指标，参考张强和李明元的研究^[29]）来促进子代收入增长，从而阻断低收入的代际传递，结果如表 7 所示。

表 7 传导机制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子代教育	子代健康	子代组织参与	子代经济往来
数字普惠金融	0.042 5*** (0.006)	0.045 9** (0.023)	0.059 4** (0.029)	0.000 5** (0.000)
子代户口	0.878 5*** (0.063)	-0.100 7* (0.061)	0.360 6*** (0.059)	-0.000 9 (0.003)
子代性别	-0.295 0*** (0.039)	0.166 9*** (0.041)	-0.078 3*** (0.029)	0.060 4 (0.048)
子代年龄	0.006 3 (0.005)	-0.027 9*** (0.005)	0.002 3 (0.003)	-0.011 7 (0.018)
父代户口	-0.163 3** (0.067)	-0.039 4 (0.067)	-0.136 7** (0.058)	-0.000 5 (0.004)
父代教育	0.309 1*** (0.024)	0.028 7 (0.025)	0.054 5*** (0.018)	-0.028 1 (0.044)
父代年龄	-0.019 0*** (0.004)	0.002 2 (0.004)	-0.001 3 (0.002)	0.117 2*** (0.028)
家庭规模	-0.081 7*** (0.008)	0.008 0 (0.009)	-0.010 3* (0.005)	0.002 9 (0.007)
常量	3.258 2*** (0.167)	-0.630 3 (2.384)	-4.019 9 (3.028)	0.191 2 (0.140)
观测值	2 829	2 829	2 829	2 829
R^2	0.272	0.036	0.068	0.020

表 7 列 (1) 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子代教育水平的回归在 1% 水平显著为正（系数 0.042 5），表明其发展能显著提升子代教育水平，削减经济对教育资源的供给限制，利于人力资本积累。列 (2) 显示，数

字普惠金融对子代健康状况的回归系数在 5% 水平显著为正 (0.045 9), 改善作用显著。可能归因于提供更多互联网健康保险和医疗援助, 简化资金筹集, 拓宽服务范围, 促进健康知识普及, 提升家庭健康素养。列 (3)、列 (4) 表明, 数字普惠金融对子代组织参与和经济往来的回归系数在 5% 水平显著为正 (分别为 0.059 4 和 0.000 5), 利于提升组织参与度, 维持社会网络, 提高收入, 阻断低收入代际传递。这与田红宇和王晶^[30]和刘魏等^[31]关于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内生发展和缓解相对贫困的结论一致。

综上, 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增加教育和健康投资影响子代人力资本, 通过提升组织参与和社会网络影响社会资本, 进而影响低收入代际传递, 验证了 H_2 。

4.4 异质性检验

城乡异质性。为了探究城乡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代际传递的影响有何不同, 本文通过对样本生活地划分, 把筛选出的代际样本分为农村和城市两类。表 8 给出了具体的回归结果。根据家庭所在地, 样本分为城市与农村。父代收入对农村和城市群体均为正向显著变量, 表明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有影响。对比发现, 仅农村低收入家庭的交互项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显著, 城镇则不显著。这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升农村子代收入, 阻断农村低收入家庭的代际传递, 对城镇居民无显著影响。此结论或因数字普惠金融使原先远离金融服务的人群受益, 打破农村信息壁垒, 降低金融门槛。随着金融普及, 乡村发展空间较城镇大,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效果更显著, 增强收入代际流动性, 阻断低收入代际传递。因此, 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改善低收入乡村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

表 8 城乡异质性检验

变量	(1)	(1)
	城市	农村
父代收入	0.192 5*** (0.050)	0.130 4*** (0.023)
数字普惠金融	0.039 3 (0.090)	0.278 6*** (0.030)
数字普惠金融×低收入家庭	0.072 4 (0.102)	-0.133 7*** (0.036)
子代教育	0.545 2*** (0.200)	0.627 5*** (0.087)
子代年龄	0.005 2 (0.059)	-0.046 6** (0.023)
子代性别	-0.014 4 (0.344)	0.158 0 (0.187)
父代年龄	-0.038 3 (0.051)	0.037 4* (0.020)
父代教育	-0.184 1 (0.218)	0.170 8 (0.121)
父代户口	-0.139 0 (0.377)	-0.545 8 (0.462)
家庭规模	0.023 5 (0.075)	-0.154 5*** (0.043)
常量	7.858 5*** (1.971)	4.909 0*** (0.878)
观测值	475	2 354
R^2	0.122	0.188

年龄异质性。由上文低收入代际现状分析可知, 个体在 30 岁之后收入水平也达到相对稳定的水平, 男性 30 岁左右实际收入与持久收入最为相似。所以把年龄这一变量以 30 岁为界划分为 30 岁及以上和 30 岁以

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不同年龄的子代家庭低收入代际收入传递的不同影响,回归结果如表 9 所示。父代收入与数字普惠金融在不同年龄层均与子代收入正向显著相关。30 岁以下群体交互项显著为负,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 30 岁前有效调节低收入代际传递,而 30 岁及以上则不显著。这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可降低 30 岁以下子代低收入家庭代际收入弹性,减轻对父代收入的依赖,阻断低收入延续。原因可能是 30 岁前年轻人初入社会,资本储备不足,需家庭支持。数字普惠金融以低门槛、高效便捷服务,减少其非家庭金融服务需求,拓宽资金来源;随着年龄增长,30 岁及以上资本积累转向传统方式,家庭依赖降低。因此,数字普惠金融更有助于 30 岁前低收入子代提升收入,阻断低收入代际传递。

表 9 年龄异质性检验

变量	(1)	(2)
	30 岁及以上	30 岁以下
父代收入	0.176 5*** (0.042)	0.146 8*** (0.024)
数字普惠金融	0.030 2*** (0.005)	0.023 0*** (0.003)
数字普惠金融×30 岁以下群体	-0.089 0 (0.058)	-0.133 3*** (0.041)
子代教育	0.372 7** (0.152)	0.687 6*** (0.097)
子代年龄	-0.037 4 (0.053)	-0.033 0 (0.034)
子代性别	0.630 8* (0.323)	0.022 4 (0.192)
子代户口	1.009 7** (0.401)	0.544 8 (0.349)
父代年龄	0.013 6 (0.042)	0.039 6* (0.021)
父代教育	0.035 8 (0.177)	0.037 8 (0.133)
父代户口	-0.747 1* (0.429)	-0.147 1 (0.371)
家庭规模	-0.043 3 (0.060)	-0.176 4*** (0.051)
常量	5.106 9** (2.329)	4.425 3*** (1.014)
观测值	890	1 939
R ²	0.259	0.162

性别差异。受传统中重男轻女、家庭角色分配等影响,女性在教育、就业、社会认同等方面的资源获取上与男性还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别收入不平等现象普遍存在。在收入分配上,性别之间的差距仍在持续增大。本文在异质性回归分析中充分考虑子代在性别方面的差异,表 10 为不同性别子代收入的异质性回归结果。列(1)和列(2)分别为男性、女性子代回归结果,均显示数字普惠金融与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于低收入家庭子代男性,数字普惠金融与父代收入交互项系数为-0.154 4,显著负相关,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男性子代收入有良好调节作用;而女性子代该系数不显著。实证表明,在相对低收入家庭中,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男性子代收入的相对代际流动,阻断低收入传递。相比之下,女性子代收入更多受父代收入影响,可能源于家庭资源分配不平等、社会文化及性别歧视等因素。资源分配倾向于儿子,加剧了性别教育与收入差异;且男性在互联网使用及金融服务获取上更具优势^[32],使数字普惠金融对其收入促进作用更大。通过对比分析发现,男性子代回归中的交互项系数绝对值(0.154 4)显著高于基准回归中该值(0.112 2),表明男性子代更多受益于数字普惠金融,实现收入提升。

表 10 子代性别异质性检验

变量	(1)	(2)
	男性	女性
父代收入	0.149 1*** (0.025)	0.118 7*** (0.034)
数字普惠金融	0.293 0*** (0.035)	0.152 8*** (0.044)
数字普惠金融×父代收入	-0.154 4*** (0.042)	-0.019 7 (0.053)
子代年龄	-0.052 3** (0.025)	-0.038 3 (0.040)
子代户口	0.721 3** (0.337)	0.644 2 (0.398)
子代教育	0.598 9*** (0.098)	0.730 6*** (0.138)
父代年龄	0.044 8* (0.023)	-0.000 6 (0.033)
父代户口	-0.533 7 (0.366)	-0.183 3 (0.424)
父代教育	0.096 1 (0.130)	0.017 1 (0.181)
家庭规模	-0.111 4** (0.046)	-0.135 8* (0.071)
常量	5.653 2*** (1.087)	6.603 8*** (1.501)
观测值	1 970	858
R ²	0.192	0.191

5 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从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3个维度构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代际传递的影响,并分别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角度探究其影响机制,进一步,将样本数据按照差异性分类,分组讨论区域的异质性,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低收入代际传递现象存在,数字普惠金融的推广和进步以及父代收入的增长均对子代的经济收入有明显的提升效果,减少了子代对父代收入的依赖,有利于阻隔低收入的代际传递。

第二,通过对数字普惠金融的3个维度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扩大覆盖广度减少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的影响,有效阻断低收入家庭的代际传递。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也存在正向的影响,但并不显著。

第三,通过分析变量间的作用机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提高子代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进而促进子代的收入提升,阻断低收入代际的传递。

第四,通过不同特征对样本进行划分并进行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在城乡差异中,数字普惠金融降低了金融门槛对低收入人群的限制,农村地区相比与城镇显示出对子代收入更大的促进作用;在年龄差异中,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显著降低30岁以下年轻子代低收入家庭代际收入弹性,减少其对于父代收入的依赖,从而阻断低收入的延续;在性别差异中,数字普惠金融对男性子代的收入有着较好的调节作用,男性子代可以比女性更多地享受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收入增加的红利。

5.2 政策启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四点政策启示。

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有效降低代际收入弹性,阻断低收入代际传递,因此,要进一步加强科技与金融的融合,推动传统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深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国家需要制定相关战略来更好地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制定相关目标的实施路径,设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长短期目标,通过推进金融科技创新和优化金融服务流程,持续提高数字普惠金融服务覆盖率,降低数字普惠金融使用门槛;制定数字普惠金融相关的监管政策和法规,确保数字普惠金融业务的合规发展;鼓励数字化技术创新,以便能更有效地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平台优势,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丰富金融产品和服务种类。同时,推动传统金融机构的数字化改革,将数字技术融入实际金融服务中。

第二,在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进程中,应着力扩大其覆盖范围。具体而言,要逐步提高线上服务和自助服务在金融服务体系中的占比。鉴于城乡接合部及人口密集地区在金融服务获取上存在一定短板,可针对性地在这类区域合理布局、开设更多的金融服务点。这些服务点不仅能提供基础的金融业务办理,还能作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宣传与推广阵地,让当地居民更便捷地接触和了解数字普惠金融服务,进而有效提高金融服务的可及性,减少因地域限制导致的金融服务空白。与此同时,积极寻求与政府部门、电商平台、社交平台等不同领域的跨界合作。政府部门掌握着大量的人口、经济等基础数据,电商平台和社交平台则拥有丰富的用户消费、社交行为等数据。通过与这些主体共享用户数据和资源,能够打破信息壁垒,构建更为全面、精准的用户画像。基于这些数据,金融机构可以更深入地洞察不同用户群体的金融需求特点,从而提供更加个性化、贴心的金融服务,满足弱势群体和小微企业在生产经营、生活消费等多方面的金融需求。

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有效提高子代收入,所以需要进一步发挥数字普惠金融杠杆作用,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和医疗资源配置,改善低收入群体的代际传递性。本文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阻断农村地区低收入群体的代际传递现象,因此,需要进一步扩大该优势。由于乡村地区教育资源相对匮乏,信息传播渠道有限,以及家庭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等,农村地区低收入家庭金融知识普及程度不高,乡村地区家庭往往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了解不够深入,难以做出明智的金融决策,更容易出现返贫风险,需要进一步提高低收入家庭子代的受教育水平,提升乡村居民金融素养。具体而言,可构建“三维赋能框架”:一是进行教育渗透,在中西部农村职业高中开设“数字金融实操”选修课程,设置“手机银行操作”“小额信贷申请”等6个学习模块,考试合格者可获一定就业补贴;二是实行场景联动,如与拼多多合作,在农资采购页面嵌入“种植贷”申请指南,成功贷款的农户可享一定折扣的种子价格优惠;三是强化激励机制,如推行“金融素养积分制”,村民参与培训、使用数字服务可累积积分,一定积分可兑换相对数量的农业生产物资,积分排名靠前的家庭可获得子代教育贷款贴息。

第四,中国各地区间金融资源分布不均匀,数字普惠金融在不同区域间和人群间的发展存在差异,发展数字普惠金融需要注意平衡地区差异。在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过程中,应注重加强城乡地区网络和数据中心的基础设施建设,确保这些地区能够接入高速、稳定的互联网服务,为数字普惠金融的普及奠定坚实基础。具体而言,一方面,在农村地区应重点扩大覆盖广度,通过“流动金融服务车+方言 App”提升基础服务可得性,进一步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服务覆盖率;配套开展“代际教育金计划”,如父代通过数字金融平台存入教育资金可享受税收优惠,资金定向用于子代高中至大学阶段的学费支出;另一方面,在城镇地区则应侧重数字化服务升级,试点“智能投顾代际账户”,如可根据父代收入自动生成子代职业发展金融规划,并根据不同地区实现一定比例的账户管理费减免政策。

参考文献

[1] 黄云,滕阳川,沈扬扬,等.中国城镇居民代际流动:基于相对贫困代际传递视角的探究[J].中国经济问题,2024

- (2): 61-76.
- [2] BECKER G S, TOMES N. An equilibrium theory of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9 (6): 1153-1189.
- [3] 樊文翔. 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农户信贷获得吗? [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1): 109-119, 179.
- [4] 田鸽, 黄海, 张勋. 数字金融与创业高质量发展: 来自中国的证据 [J]. *金融研究*, 2023 (3): 74-92.
- [5] 赫国胜, 耿哲臣, 蒲红霞. 数字普惠金融对私营企业及个体就业的影响 [J]. *财经论丛*, 2021 (5): 49-58.
- [6] 何宗赓, 宋旭光. 数字经济促进就业的机理与启示: 疫情发生之后的思考 [J]. *经济学家*, 2020 (5): 58-68.
- [7] 谢绚丽, 沈艳, 张皓星. 数字金融能促进创业吗?: 来自中国的证据 [J]. *经济学(季刊)*, 2018, 17 (4): 1557-1580.
- [8] 张勋, 万广华, 张佳佳, 等. 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 [J]. *经济研究*, 2019, 54 (8): 71-86.
- [9] WEN C, YANG J, LIU G, et al. Big data driven internet of things for credit evaluation and early warning in finance [J]. *Future Generation Computer Systems*, 2021, 124 (4): 295-307.
- [10] DONG X, CUI R, BAI X, et al. Can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reduce household poverty? Evidence from the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24, 96 (11): 103603.
- [11] 赵立业, 吴卫星.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吗? [J]. *财经问题研究*, 2023 (5): 64-75.
- [12] 周广肃, 丁相元. 数字金融、流动性约束与共同富裕: 基于代际流动视角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3, 40 (4): 160-179.
- [13] 宋文豪, 黄祖辉, 叶春辉. 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 来自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的证据 [J]. *中国农村经济*, 2023 (6): 92-113.
- [14] 陈东平, 丁力人, 高名姿. 共同富裕背景下数字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2 (6): 171-182.
- [15] 徐建奎, 张龙耀, 倪丹梅. 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中的同群效应研究 [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3 (6): 176-186.
- [16] 尹志超, 张号栋. 金融可及性、互联网金融和家庭信贷约束: 基于 CHFS 数据的实证研究 [J]. *金融研究*, 2018 (11): 188-206.
- [17] 王正位, 向佳, 廖理, 等. 互联网金融环境下投资者学习行为的经济分析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6, 33 (3): 95-111.
- [18] 吴冰彬, 王林萍.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家庭发展韧性的影响研究 [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23 (7): 56-60.
- [19] 方福前, 田鸽, 张勋. 数字基础设施与代际收入向上流动性: 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J]. *经济研究*, 2023, 58 (5): 79-97.
- [20] ZHU H, ZHU J, ZHU Y. Quantifying change: the impact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across income quantiles in China [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25, 91 (6): 102399.
- [21] 焦克源, 陈晨. 社会资本对农村贫困代际传递影响机制研究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0, 30 (4): 166-176.
- [22] SOLON G.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2, 82 (3): 393-408.
- [23] 孙三百, 黄薇, 洪俊杰. 劳动力自由迁移为何如此重要?: 基于代际收入流动的视角 [J]. *经济研究*, 2012 (5): 147-159.
- [24] 何石军, 黄桂田. 中国社会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趋势: 2000~2009 [J]. *金融研究*, 2013 (2): 19-32.
- [25] 李任玉, 杜在超, 龚强, 等. 经济增长、结构优化与中国代际收入流动 [J]. *经济学(季刊)*, 2018, 17 (3): 995-1012.
- [26] 杨帆, 曹艳春. 共同富裕目标下我国低收入群体可持续增收推进机制构建研究: 基于 SSM 的分析框架 [J]. *经济问题探索*, 2023 (2): 1-16.
- [27] 张勋, 万广华, 张佳佳, 等. 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 [J]. *经济研究*, 2019, 54 (8): 71-86.
- [28] 李芳芝, 张焕明. 代际流动影响主观幸福感吗?: 基于 CGSS 2015 的经验证据 [J]. *统计研究*, 2021, 38 (3): 107-121.
- [29] 张强, 李明元. 先赋性还是自致性: 城市流动人口贫困代际传递: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2010—2014)的实证分析 [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 45-57.
- [30] 田红宇, 王晶.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吗?: 来自生计资源多元化视角的证据 [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4 (1): 1-13.
- [31] 刘魏, 张应良, 王燕.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缓解了相对贫困吗? [J]. *经济管理*, 2021, 43 (7): 44-60.
- [32] 廖理, 初众, 张伟强. 中国居民金融素养差异性的测度实证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9, 36 (1): 96-112.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Low-income Groups

WU Xianrong LUO Xiaofeng

Abstract: China has achieved extraordinary milestones in construct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and eradicating poverty, yet the low-income demographic remains substantial, with the persistent challenge of intergenerational poverty transmission casting a shadow over the march toward common prosperity. This study employs the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dex and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data to empirically investigate how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disrupts the intergenerational cycle of low-income status. Key revelations emerge: First, the advance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higher parental income substantially elevate offspring earnings, weakening economic reliance on parental resources while fostering self-sufficiency and upward mobility, effectively dismantling intergenerational poverty chains. Notably, the coverage breadth of digital financial services proves most pivotal in severing this transmission. Second,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cts as a catalyst for offspring human and social capital accumulation, amplifying income prospects and disrupting poverty's hereditary patterns. Third, its transformative power shines brightest in rural communities, among low-income families with offspring under age 30, and particularly within male demographics. Building on these insights, targeted policy frameworks are proposed to amplify digital finance's role as an economic equalizer, accelerating progress toward equitable prosperity.

Keywords: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Low-income Groups;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责任编辑 卫晋津 张雪娇)